

学校代码: 10200
分类号: K11

研究生学号: 2014100903
密 级: 无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剖析 The Analysis of Shūmei Ōkawa's "Moral Country" Theory

作者: 陈俊杭

指导教师: 周颂伦 教授
一级学科: 世界史
二级学科: 世界史
研究方向: 日本史
学位类型: 学术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学校代码：10200
分 类 号：K11

研究生学号：2014100903
密 级：无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剖析

The Analysis of Shūmei Ōkawa's "Moral Country" Theory

作者：陈俊杭

指导教师：周颂伦 教授
一级学科：世界史
二级学科：世界史
研究方向：日本史
学位类型：学术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7年 5 月

摘 要

大川周明是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民间的法西斯理论家。大正初期，大川周明宣传日本称霸亚洲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一战后，大川认为国内的社会矛盾使日本无法实现亚细亚主义，对此提出“国家革新运动”，推翻政党政治，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道义国家”。本文主要剖析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大川周明的“国家改造运动”思想和亚细亚主义。大川周明出于鼓吹日本征服亚洲邻国、和西方争霸对抗的意识，随意地阐释中国儒家和印度宗教，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国家哲学“道义国家”思想、概括东方文明原理：内在的道德精神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进步。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国家的本质是以“君民一体”的神道精神为中心形成的共同体。“君民一体”的天皇制国体就是日本国家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以个人功利主义为中心的西方化，与天皇制国体的“道义”不相合。因此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与大正民主运动潮流相对立。在对外关系方面，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达亚细亚主义，日本为“复兴”东方传统思想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东方“道义国家”思想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原理，打着“道义”的旗号为日本殖民统治亚洲邻国强辩。

关键词：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日本主义；天皇中心主义；亚细亚主义

Abstract

Shūmei Ōkawa was an important personage in the history of statism thought of modern Japan and civilian fascism thinker. At the early Taisho period, he disseminated Asianism, which was the support for the expansion of Japanese Empire in Asia.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he thought problem of Japanese society hindered the achievement of Asianism. So he started national innovation movement , which aimed at overthrowing party politics and establishing “Moral Country” that based on Tennō system. This paper is the analysis of Shūmei Ōkawa’s “Moral Country” theory, to dissect Shūmei Ōkawa’s national innovation movement and Asianism. For the purpose of dominating Asia and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with the antagonism to western, Shūmei Ōkawa put forward “Moral Country” theory to summarize the structure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 which was based on his maliciously explan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Indian religion. That is the improvement of mora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e used his theo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haracter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s a community, which founded on Shintoism taking unity with monarch and people as core. Tennō system with monarch and people untied is a kind of “moral”. Problem of Japan’s society is from westernization based on utilitarianism and personalism,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moral” of Tennō system. Therefore he objected to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party politics, which became the backset against Taisho Democracy. As for the foreign concept, Shūmei Ōkawa expressed Asianism by “Moral Country” theory. Japan set up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for the “revival” of Oriental traditional ideology. Oriental “Moral Country” theory was the principle of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fact , it is the sophism for glorifying the invasion of Asia.

Key words: Syūmei Ōkawa ; Moral Country ; Japanism ;Tennō system ;Asianism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II
引 言	1
一、“道义国家”思想的形成	5
(一) 学生时代的思想——宗教思想的形成	5
1. 对宗教的追求和研究	5
2. 道会的加入	6
(二) 人生思想的转变——日本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8
1. 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8
2. 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9
(三) “道义国家”思想的提出	11
1. 一战后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11
2. 大川周明的时代认识和“国家革新”运动	12
二、改造社会的“道义国家”理论	15
(一) 宗教伦理论——“道义国家”的基础	15
1. 人的本质	15
2. 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	16
(二) 国家和社会的原则——“道义国家”论的内容	20
1. 国家的本质	20
2. “道义国家”的三原则	22
三、“道义国家”理论的实质	25
(一) 日本主义的立场	26
1. 日本主义的含义及发展	26
2. “道义国家”论的日本主义实质	30
(二) “道义国家”思想和东方文明的特性——东西方对抗论	31
1. 亚洲民族独立论	31
2. 亚洲民族精神的独特性	32
(三) 复兴“道义国家”精神的“大东亚圈”——日本支配亚洲的理论	34
1. 对东洋精神的传承——日本优越论	34
2. “复兴道义精神”——日本支配亚洲的逻辑	35
结 论	38
参考文献	40

附 录.....	42
后 记.....	43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43

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一战后，日本大正民主运动兴起。与此同时，对抗大正民主运动的革新右翼势力活跃起来。革新右翼采取种种的行动改变现存体制，称为“国家改造运动”或“国家革新运动”。他们宣扬国家主义，要求民众绝对地服从国家权威，攻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淡化国家意识；对外方面鼓吹征服扩张的亚细亚主义，反对抑制扩张的协调外交。革新右翼的思想宣传和行动促成了法西斯体制的形成。

在革新右翼势力当中，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大川周明（1886年——1957年）。一战后，大川周明认为日本由于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无法实现亚细亚主义的理念，便成立犹存社、行地社，宣扬国家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批评政党内阁，反对协调外交，鼓吹“满蒙分裂”。二战期间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为日本的扩张辩护。战后大川周明沦为了甲级战犯。

大川周明在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他建立一套包含国家革新运动、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体系。通过著述和演讲宣传其思想，鼓动社会反对政党内阁、支持对外强硬论，造成了对军部有利的社会舆论。在二战期间和官方的战争行动相一致，为军方作理论辩护，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东西方文明冲突论”，被称为“大东亚的论客”。第二，和军部的密切关系。大川周明在军方内部宣传国家革新运动思想，并和幕僚军官策划三月事件、十月事件，推动政治形势的转变。无论是思想宣传还是政治运动，大川周明在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对大川周明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日本近代国家主义如何发展为极端的超国家主义；革新右翼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如何促成日本社会走向法西斯体制。和其他国家主义者相比，大川周明显著的特征是学者的身份和形象，其影响主要在理论的建立和宣传。大川周明进行国家改造运动的理念是他的国家哲学“道义国家”思想，将理想国家看作是以“道义精神”为原理的有机组织，以实现“道义的国家”作为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大川周明为什么提出“道义国家”思想作为政治运动的原理？其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其最终意旨是什么？本论文以“道义国家”思想为研究对象，剖析大川周明的国家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在的理念。

（二）先行研究状况

在战后初期，大川周明的思想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大川周明的著作。这一时期，在日本思想界里，反省战争成为一个话题。而大川周明鼓吹天皇崇拜、“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被认为是违反历史潮流，留下恶名，备受冷落。

自从70年代以来，大川周明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以下将学术的研究情况分为人

物评传和思想分析。

对大川生平事迹的梳理和评述属于基础研究。早期的成果如下：1963 年，竹内好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大川周明的亚洲研究》的记录；1965 年大川周明的追随者金内良辅在《文艺春秋》发表的文章《革命儿·大川周明》；1975 年，桥川文三在其主编的《大川周明集》末尾作的解说。对大川生平事迹深入研究的著作有：铃木正节的《道会和大川周明》（武藏大学人文学会杂志，1985 年），独协大学大塚健洋教授的《行地社月刊<日本>目录及题解》（《姬路法学》第 3 期、第 5 期，1989 年），《大川周明和近代日本》（东京：木铎社，1990 年）和《大川周明——复古革新主义者的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 年），拓殖大学刈田徹教授的《大川周明和国家改造运动》（东京：人类科学新社，2001 年）。

本文立足于上述的人物传记研究，通过论述大川周明早期的经历，分析其思想形成的过程。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当中，对大川思想理论的评析非常多。有的定性为法西斯主义理论，如丸山真男和荣泽幸二。丸山真男总结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普遍特征，指出其反资本主义的“精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以思想的变革代替现实社会变革，大川周明的国家观带有这一特点。荣泽幸二通过对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的深入分析，以论述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质。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将本国本民族看作是最重要的集体。民族国家是以道德精神为纽带结成的有机体，个人是国家的有机组成。法西斯主义把对国家的忠诚和灭私奉公的精神视为“国粹”，并以此动员国民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权力、支持对外战争。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本质上是极权主义，以儒家的诚学和天皇崇拜的理念等历史传统作为“道义”，视其为国民必须发扬的“日本精神”，鼓动国民对内服从极权政治，对外支持“大东亚圈”。

有的学者反对以法西斯论评价大川周明，他们认为法西斯论有碍于对大川思想的理解，不能明了其内在的原理。大川的思想核心在于复古主义，包括日本国粹主义和亚细亚主义。大川周明不仅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而且还要超越近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识，寻求一种兼顾近代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发展方式。近代以来，亚洲国家为了抵抗西方侵略，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但是却陷入了近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困境。西方文明对本土历史传统的冲击不利于保持民族认同意识。因此大川周明宣扬“日本精神”、“亚洲民族精神”或“东洋精神”。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野岛嘉响、大塚健洋。他们的评析有明显的缺点：没有说明其极端利己的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不能解释清楚大川周明为什么一面宣扬对抗西方化的亚洲传统精神，一面支持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复古主义以亚洲历史传统对抗西方文明，排斥西方化，实际上是日本为争夺在亚洲的霸权而与西方对抗，所谓“复兴亚洲传统精神”只是为日本取代西方统治亚洲的战争行为辩说而已。

近来，更多的学者深入研究大川周明的宗教哲学，说明其国家革新运动、亚细亚主义内在的原理。大川周明在宗教方面的著述很多。他是以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展开复古主义论，阐述国家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是最近研究的新动向。石川晃司指出，大川周明通过对东西方宗教的对比，突出东方传统思想的意义，并以东方的宗教思想为基础建立“道

义国家”理论。屿本隆光认为大川周明研究宗教的目的是寻求宗教的普遍性，以此为指导原理建立“道义”共同体。前川理子全面考察大川的宗教思想和国家观之间的关系：大川在“道义国家”论的框架内，以自己的宗教论说明天皇制的意义；复古主义论的思考方式源于以原典文本为中心的宗教研究范式；恶用思想界的宗教融合论，将其解释为日本称霸世界的文明论依据。这种研究方式不再是以法西斯论评析大川周明的国家思想，而是深入剖析其内在的理理论，说明其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他如何基于自己的理理论将帝国主义正当化。

和日本的研究状况相比，中国学界的相关著述主要是一般性介绍，如介绍大川周明的亚细亚主义扩张思想、天皇崇拜和日本精神论、“满蒙分裂”论。如赵哲《大川周明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崔新京《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日本研究》2002年第4期）；田富《论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和《论大川周明的历史观》（《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国内最早对大川周明事迹作详尽研究的著作是万峰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该书对大川在满铁的活动有详细的论述。

中国社科院吴怀中先生著述《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东京：侨报社，2007年），梳理大川周明的中国观及政治实践。作者在著作中谈到，大川周明认为日本具有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优越性，其优越论的依据是日本通过近代化的成功实现了“脱亚”。而中国停留在前近代社会，没有成为具备现代政治能力的国家。因此他拒绝西方民主式的民族自决和平等思想，坚持在日本充当盟主的前提下，实现“保全”中国，反对限制对中国扩张的协调外交，进而攻击政党内阁。这是从他的中国观来说明“国家革新运动”的动机。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和日本学界相比，中国学界关于大川周明国家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学界的研究更多地是对大川作一般性的介绍，说明其具有法西斯主义者的一面。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关注大川周明和中国的关系，如在满铁的活动，对中国的认识。日本学界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仅强调其法西斯主义的一面，而是深入分析其内在的原理，即大川周明到底以什么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论起点，以此来展开国家思想。关于大川的理理论，日本的学界已经指出几点，一是复古主义，以民族历史传统排斥西方化，和西方全面对抗，如日本国粹主义，亚洲精神论。二是宗教思想，构成了复古主义的理念依据，也是国家思想的哲学基础。而“道义国家”思想，集中体现了大川的复古主义和宗教思想。本论文以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道义国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大川周明国家主义和亚细亚主义内在的理理论。他所强调的“道义”究竟是什么，如何以“道义”作为“国家革新运动”的行动“准则”？通过研究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理论，有助于揭示昭和前期国家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三）研究重点和方法

研究重点是“道义国家”思想的实质。本论文不仅要说明“道义国家”思想的主要

内容和理论体系，还要说明“道义国家”思想的最终指向：大川周明为什么以“道义国家”理论作为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道义国家”论最终的归结点是什么？另外，大川周明宣传“道义国家”、“复兴亚洲精神”这样的美妙言辞，实际上是支持日本侵略亚洲邻国，他如何以“道义国家”论为日本的战争行为辩护？这些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学实证方法，通过对大川周明的主要著作等文献资料的解读，将其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大川周明的认识并不是纯粹个人的独特想法，而是带有同时代社会思想的普遍特征，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向。因此本论文将他的思想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考察，通过和同时代的社会思潮进行对比，说明他所处的地位，以此把握其思想本质。

一、“道义国家”思想的形成

（一）学生时代的思想——宗教思想的形成

1. 对宗教的追求和研究

大川周明于 1886 年出生于山形县饱海郡（今酒田市）的一个医生的家庭。在中学期间，他跟汉文教师角田俊次学习儒家，打下了汉学的基础。

大川周明在学习汉学的同时，跟法国天主教神父马顿（Mathon）学习法语。他在这时期开始了解基督教，并开启了他的宗教意识。虽然他最终没有皈依基督教，但是由此开始思考世界和人生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决定将来攻读宗教哲学。

1907 年 9 月，大川周明开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大学期间，大川周明接触到很多来自德国的宗教学说。在这一氛围中他自己也推崇德国哲学。关于宗教的本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

施莱尔马赫是 18 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宗教学说的特征是“把宗教从知识和行为中解放出来，宗教是基于对神的敬虔感情而形成的。因此重点在于个人宗教经验。对他来说，宗教的本质是敬虔”。更确切地说，“宗教是有限者和无限者一致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教理和仪礼如同四季衣裳变换一样变化，但是绝对皈依的感情没有变。我们感觉到我们依靠无限者得以生存、活动，这是宗教真正的故乡之所在。如此，所有宗教的外衣千差万别，但是都有同等的、普遍的根底”。因此，宗教研究“不是崇拜对象的研究，而是宗教人格本身的研究，宗教感情起源及发展的研究”。宗教的核心是敬畏虔诚的感情，道德行为规范和神学教义只是衍生物。因此宗教研究的重点不是看崇拜的对象，而是宗教徒的精神。

大川周明在大学期间师从高楠顺次郎，研究印度宗教哲学。他对印度宗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印度宗教作如下总结：“印度精神在吠陀时代，早已把握了潜藏在万象背后的一如，接着到了奥义书时代，领悟到‘我即是梵’、‘汝即是它’这一金刚不坏的真理。正统印度的精神要求，就是要将此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繁杂的印度哲学宗教，它们都有一个归结点，就是通过精致的理论与严谨的修行，磨炼人的理智和情感，消去一切不足，从而达成自我，最终归一到梵。”他认为印度宗教的核心在于梵我和一的思想，即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归一到梵，实现个人精神的至善。大川周明对印度宗教非常

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東京：講談社，2009 年，第 32 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 1 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 年，第 776 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 1 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 年，第 786 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 1 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 年，第 780-781 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 1 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 年，第 788 頁。

热衷。“当时满足我灵魂渴求的圣泉，就是简洁明了概括正统印度精神的薄伽梵歌，我到现在也非常重视它。”可以知道，大川周明的精神生活受到印度宗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川周明带着关于世界和人生的问题学习宗教。在大学时期的宗教学习中，大川深受施莱尔马赫的虔敬论和印度宗教《奥义书》思想的影响：从虔诚感情的层面认识宗教的普遍性，而非执着于宗教崇拜的对象；追求神人合一以实现精神进步。实际上，他选择上述的宗教思想，形成自己的宗教观，以解答世界和人生的问题。大川周明的宗教哲学观在在大学时期的宗教学习过程中逐渐成型，构成他日后道义国家思想的哲学基础。

2. 道会的加入

大川周明的宗教观不仅源于学校和书本上的理论学习，还受到民间宗教团体的影响，即在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得到深化。在大学期间，他加入民间宗教组织“道会”。以下简单介绍道会。

道会创始人松村介石（1859 年——1939 年）是日本民间宗教家。松村介石原来是热心于传教的基督徒，但是后来他对西方传教士的作风感到不满：拘泥于戒律仪式和神学理论，而忽略了根本的信仰，不能满足人们得到心灵寄托的渴求，无助于个人道德精神的进步。于是他脱离基督教组织，自立门户。松村将儒家思想引入基督教，创立新的宗教思想，并为新教团命名为“日本教会”，后来改名为“道会”。松村介石以“道”的观念为核心，以信神、修德、爱怜和永生为信条，建立一套宗教理论。

道会的思想，如同教团的名称，是以道的践行为中心。道是人人生而知之的人伦。

由于人们没有很好地坚守道，所以圣人设教，使人们牢记道的意义。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由此诞生。所以道是天赋予的、永恒不变的，教是人为的、可变的。现在的宗教源于古代，因此已经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创立道会的目的，就是以道为核心，参照古代圣贤说教，再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创立宗教。简言之，道会的宗旨就是向世人揭示道，使人们守道行事。

践行道的方式是遵守道会的四条纲目，即信神、修德、爱怜和永生。信神就是信仰宇宙的神。传统宗教所说的耶和华、天帝、佛本质上都是宇宙的神。神存在于万事万物，也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神的滋养。人类的精神也是神赋予的。“神在你们的心中，你们心中的良知良能就是神的命令。”神赋予人类的使命是“培养智慧以探求神的造化之理，通过修德完善人格。也就是逐渐摆脱自然动物的状态，创建社会、建立国家、发展人文，宣传德教，亲子相爱、夫妇相和、朋友互信、邻人相扶”。

大川周明：『安楽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788頁。

松村介石：『道会の主張』，東京：天心社，1912年，第1-2頁。

松村介石：『道会の主張』，東京：天心社，1912年，第2-3頁。

松村介石：『道会の主張』，東京：天心社，1912年，第4-5頁。

松村介石：『新宗教』，東京：香山吉助發行，第102頁。

松村介石：『新宗教』，東京：香山吉助發行，第85頁。

修德就是自我修养。很多宗教徒只重视和神的沟通，而不重视道德修养，有的还形成卑劣的品格。这样的话，宗教就会变成仅仅是自我欣赏的、自欺欺人的空想。信仰神的要旨是遵照神的意旨行事，这个意旨就是修德和爱怜。

爱怜，就是爱人、爱国和爱世界人类。长期以来，宗教更多地关注个人幸福和来世，如果不重视爱怜，宗教就会陷入利己主义。道会对此特别强调拯救世人，在现世积极行动，让更多的人遵守“道”。爱怜还有伸张道义的含义，道会会员为了拯救世人，应具备积极的奋斗和奉献精神。

永生，就是相信灵魂不灭、来世和因果报应。如果没有来世观，就会为无常观所困扰，造成人生的精神烦恼。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进入灵界，接受上帝的审判。

道会的仪式没有硬性的规定。“入会仪式、婚礼、葬礼、礼拜仪式等，所有仪式，根据国家和时代的情况而制定。”按照道会思想的解释，宗教的本质在于彰显道，只有道是不变的。而仪式是人为的，可变的，因此道会规定仪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综合上述，可以知道，道会宗教思想的特征是重视现世，强调德行培养，反对脱离现实而一味关注来世。信神的要求就是修德和爱怜，如此则将宗教和现世生活紧密联系。道会着重说明宗教的核心是构成道德精神来源的“道”，对仪式不作过多的要求。以上的观点是松村介石基于他对基督教的批评而提出来的。

1910年7月，大川周明加入道会。一般认为，大川加入道会的原因主要是道会的思想接近于他的宗教理想，这使他对道会产生兴趣。两者思想的一致性表现在：第一是追求宗教的普遍性，打破宗派意识。第二，重视现世生活，关心个人的信仰和道德精神的锻炼，而不是脱离现实专注于来世，或拘泥于神学或仪式。

大川周明在道会的活动主要有听讲松村介石的宣讲，在道会的刊物《道》发表文章，介绍道会的思想。大川周明在《道会问答》一文中解释道会的信条。关于信神的意义，“我们的神不是超越宇宙的艺术家的、也不是裁判官，而是内在于宇宙、贯穿天地人的精神。一切统一于此精神，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神就是语言本真意义上的存在，存在的也只有神。”“我们坚信神与人有同一性。如果不是这样，神人关系最终沦为外在的形式……神是在我们自身内活动的生命，是赋予我们灵性生命的生父。正因如此，我们在学问上能够探讨宇宙真理，在艺术上能表现实在的真意。”修德的意义是实现个性的发展。“我们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性。我认为，坚持实现个人性，是生于此世的理由。为此就要践行各种各样的道德，其中最根本的是力量，即强大的意志。我们要唤起强大的意志，和来自内外的各种诱惑战斗，通过实践，把不模仿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彰显出来。这就是修德。”爱怜的意义是：“我们的生命是个人的，同时又是超个人的。因为，在我们自身活动的生命，在其他人的，甚至是一切万物中活动着。通过我们的实践，

松村介石：『道会の主張』，東京：天心社，1912年，第43頁。

松村介石：『道と宗教』，東京：天心社，1909年，第34頁。

松村介石：『新宗教』，東京：香山吉助発行，第316頁。

松村介石：『道会の主張』，東京：天心社，1912年，第12頁。

前川理子：『近代日本の宗教論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264頁。

大川周明：『道会問答』，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77頁。

大川周明：『道会問答』，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78頁。

将自他归一的事实展现出来就是爱。因此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我们以此发展生命中超个人的一面。”最后关于永生的含义：“与神同在的人，在感觉到自己渺小的同时，也感觉到和无边无际的宇宙一样的广阔。自己作为有限的生命，常常感觉到悠久无限。”永生就是追求生命永恒。

大川周明对于道会信条的解释，尤其是对修德、爱怜的解释，带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如修德就是以意志力战胜诱惑，实现个性，爱怜源于个体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松村介石所没有提到的。他通过对道会信条的阐释，形成自己的宗教和伦理哲学。后来他所提出的道义国家的伦理基础是克己、爱人和敬天三原则。克己、爱人和敬天分别和修德、爱怜和信神对应。但是关于永生的观念在后来没有提及。简言之，大川周明关于宗教伦理哲学的思想框架源于道会信条的影响。

（二）人生思想的转变——日本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大学毕业后，大川周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关注现实政治问题，并且由国际主义者变成日本国粹主义者和亚细亚主义者。

1. 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对于大川周明来说，思想上的转变，成为日本国粹主义者是重大的经历。他在《日本精神研究》写道：“经历精神上多年的游历之后，我再次回归到我的心灵故乡。在日本精神之内，才看到长期求不到的东西。”“日本精神”论是大川周明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对日本现实问题的看法，其背后的世界观是“日本精神”，有时表述为“大和魂”。促成大川周明日本国粹主义思想形成的契因是天皇列传的撰写。

松村介石认为，日本国民生活的中心是天皇，所以为了让国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应该编写通俗易懂的历代天皇传记，并印刷散发给大众。1912年春天，他找大川周明商谈关于编写的事情，提议让大川编写原稿，自己加以评论。大川答应了。

关于编写天皇列传的思想意义，大川周明回忆道：“我的思想体系，本来极具有国际主义的色彩。”“由于日本史的研究，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向。我因为这件事，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其后的思想及行动，以这一自觉意识为根底。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变得很有意义，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一经历使他的思想从国际主义变成日本主义。

1913年9月，大川周明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日本文明的意义及价值》。这篇文章集中阐述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以及在亚洲文明史中的意义。大川首先说明日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原因。“在世界上无以伦比的皇统延绵，未受外邦征服的、不可

大川周明：『道会問答』，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78頁。
大川周明：『道会問答』，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79頁。
大川周明：『日本精神研究』，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108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03頁。
大川周明：『偶然なる思想の一大転機』，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80頁。

冒犯的尊严，保持祖先思想感情，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护持者。因此我们的意识就是全亚洲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就是全亚洲思想的表现。日本文明无与伦比的意义及价值实际上就在这一点。”即日本保持自身民族特性，因此善于保全外来文化。日本吸收亚洲大陆国家的传统思想，因此传承了亚洲文化。关于日本民族特性和文明的原理，大川周明将其追溯到纪伊神话。“向我们叙述原始日本的，无疑就是古事记。”“日本历史，就是古事记表现出来的‘惟神之道’不断地实现的历程。”他将《古事记》的宇宙形成、诸神诞生概括为宇宙生命力的发展。内在于宇宙的统一原理最后表现为天照大神。由此引出天皇崇拜的观念。“他们深信不疑，日本国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本身是奉承经营国土的神敕、随从天孙降临的诸神的子孙。这一信仰叙述着难以撼动的真理。天皇在日本国的地位，犹如天照大神在宇宙中的地位，如同宇宙的一切只有在天照大神统一的全体当中才有存在的意义一样，所有的日本人只有在由天皇统一的国家当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使日本皇室成为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这一思想。”

“如此，我们以皇室为中心过着无比坚固的共同体生活。”他将日本民族的特性、日本文明的原理概括为“惟神之道”、天皇崇拜，表现出强烈的天皇中心主义思想。

接着他在文中阐述日本引进中国儒家和印度佛教的特点和意义。日本引进儒教以丰富国民的道德，引进佛教以充实宗教生活。而这一切都以坚持神道和天皇制为核心和前提。最后总结道：“通过如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知道，我们的文明就是亚洲文明的统一。我们在过去摄取所接触的一切文明，不断地发展高层次的文化。这就是日本文明的意义及价值”。他预言未来，日本要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意义是“世界文明的形成”。

在此对大川周明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作小结。天皇列传的编写，使大川周明专注于日本传统思想研究，形成了日本国粹主义的思想，称为“日本精神”。大川周明的日本精神论有两点，一是天皇中心主义，天皇制是日本文明的原理。二是日本优越论，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保持民族主体性，引进亚洲的传统思想儒家和佛教，传承亚洲传统思想，同时保持日本文明原理天皇制。天皇中心主义成为大川周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理念。

2. 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很多的亚细亚主义者从“保全中国”的思想出发，形成自己的亚洲观。但是大川周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85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85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87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88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93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93頁。

明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却从对印度的关注开始。大川周明大学毕业后，每天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钻研印度宗教。1913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川周明外出散步，途中在东京神田旧书店偶然见到一本著作，题为《新印度》。作者是英国人亨利·戈登。戈登家族三代人曾担任印度殖民地的官吏。戈登著书的目的是要向英国提出建议，改善殖民统治方式，否则印度的形势会恶化。在接触这本著作以前，大川周明对印度现状不了解，只知道印度是宗教圣地。他从这部书了解到印度现实的惨状。“此时开始我见到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悲惨。我开眼看到现实的印度，这我和脑海中描绘的印度有如天地悬隔的差异，对此感到震惊、心痛、并且愤慨。”在知道印度的现状后，大川周明接着翻阅书籍，了解到亚洲各国遭受西方侵略。从此大川周明关注国际政治，决定要“保全亚洲”。

此前他对亚洲现状不了解，只热衷于印度宗教研究，但是现实中，亚洲国家遭受西方奴役，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大川周明思考亚洲落后的根源。对于亚洲落后的原因，大川周明解释道：“我开始认为，亚洲苦难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像我那样的追求，对出世生活的倾慕之心。亚洲的努力，尤其是印度最大的努力，在于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并且以此把握伟大的、平等一如的精神原理……然而亚洲没有致力于将把握的真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实现。其结果是，形成了内在的个人生活和外部的社会生活相互分离的小乘亚洲，一方面，精神原理逐渐硬化，另一方面，社会制度腐败，最终臣属于白人阿修罗。亚洲必须复活原来的高贵精神，摆脱这种二元的生活，在现实实现妙法，成为独一无二的大乘亚洲。因此，我们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生活，需要与我们的精神理想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这样思考，所以我开始对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研究产生兴趣。从大乘的观点来看，喝茶吃饭亦是第一要义，如果堕入小乘，读经打坐亦是第二要义。”

大川周明认为亚洲传统思想的长处是探索个人精神的进步，即追求内面的精神自由。这种认识和他研究印度宗教的经历有关。他从对印度宗教的理解出发，认为亚洲的传统思想就是重视个人内在的精神进步，如印度宗教。既然个人精神非常发达，那么为什么亚洲国家落后？大川周明解释为轻视外在的社会制度建设，脱离现实。所以今后要关注现实政治。此后大川周明不再埋头于书斋、脱离现实，而是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作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宣扬亚细亚主义，以保护亚洲为名义，鼓动称霸亚洲的舆论。

1916 年，他在《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和由来》一书，说明当今日本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是亚细亚主义。他在开头说：“日俄战争以胜利告终以前，活泼的生命尚在日本国家当中活跃着。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奋斗不息的精神，支配国民的心。然而战胜了俄国，进入了世界一等国行列的同时，明治日本 ideal 在表面上实现了，与之一同振作的心松懈下来，并且新的国民理想尚未确立，因此到了今天的大正时代，呆滞颓废的风潮弥漫起来。”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世界强国，日俄战争的“胜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 1 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 年，第 789 頁。

大川周明：『復興亞細亞の諸問題』，東京：大澄閣，1922 年，第 4 頁。

大川周明：『印度に於ける國民運動の現状及び其の由来』，橋川文三編集：『大川周明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 年，第 11 頁。

利”实现了这一“理想”。如今日本并没有发展目标。那么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他接着写道：“这样的理想就是使皇国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本来我们以使皇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作为最后的理想，但是必须觉悟到，首先在亚洲实现这一理想，是君国现前的大使命”。“我国的先觉在五十年前，已经道破：‘何止强兵，何止富国，布大义于四海。’强调皇国在世界上的使命。新日本的国民必须以严肃的态度，肩负这一森严雄浑的职责。而亚洲的领导和联合，实际上是日本获得布大义于四海的实力的唯一的途径”现在日本的“最高理想”就是将亚洲联合起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以称霸亚洲作为日本当前的目标。此后，大川周明一直以亚细亚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国际形势，这个基调直到昭和前期也没有改变。

（三）“道义国家”思想的提出

1. 一战后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大川周明开始踏上亚细亚主义者道路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8年，一战结束。在大战结束前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国际社会，民主思潮流传开来。参战国美国为了掩盖争夺世界霸权的目的，打出维护自由、反对独裁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渲染成为民主和专制、和平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间的战斗，协约国的胜利被看做是民主的胜利。同时，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等专制帝国崩溃，爆发了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这些现象促使民主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国际社会的另一变化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团体和知识分子，促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西方出现民主和革命风潮的同时，日本国内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经济社会矛盾凸出，由此爆发了群众运动。日本在大战时期出现经济景气，但是同时经济矛盾逐渐凸显，工人罢工急剧增加。1918年，米价暴涨更加严重。然而政府未能有效处理，没有权力的民众痛恨投机商，“米骚动”事件就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米骚动由地方性的事件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战后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给人民生活带来负担，工人罢工和佃农运动频频发生。总之，大战结束前后，日本经济社会矛盾尖锐，民众运动频发。

在政治层面，这一时期处于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成立团体，宣扬民主主义思想，如黎明会、新人会、民人同盟会等。学生、工人和工商业者组织团体，发起游行和集会活动，要求实现普选。还有的知识分子介绍十月革命，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日本共产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霸。在同一时期，保守的国家主义者敌视民主，竭力宣扬国体观。如赤化防止团、建国会、大和劳民会等团体以国体观排斥社会主义，担心社会主义会引起动乱。

简言之，在一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矛盾凸显而出现的民众运动的频发，民主思潮发

大川周明：『印度に於ける国民運動の現状及び其の由来』，橋川文三編集：『大川周明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第12頁。

展至高潮。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为维护天皇制而与民主思想对抗。日本的社会和思想界出现民主化和天皇制原理之间的激烈冲突。

2. 大川周明的时代认识和“国家革新”运动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动中，给予大川周明影响最大的是米骚动事件。“国家出兵海外的时候，因为米价暴涨而引发暴动，很快暴动蔓延至全国数十处地方。这件事给国民深刻的暗示。我认为天意显示日本国家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认为米骚动事件表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严重，使日本“无法承担拯救亚洲的重任”。因此要进行“国家革新”运动，消除社会矛盾，才能够称霸亚洲。对于社会矛盾，他分析道：“我们为什么强调第二次维新的必要性？因为日本是君臣一体的国家。‘君’通过第一次维新从武力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但是‘民’为金钱压迫而呻吟，因此从金钱支配下解放国民，是恢复君民一体之实的唯一的途径。”“金钱”指的是和政党官僚结合的财阀，“历代政府对国民生活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由于种种关系形成的保护权力阶层、富豪阶层的政策，这两者相互结合，压迫一般的国民。”大川周明批评官僚政党和财阀富豪的“跋扈”违背君民一体的理想社会，鼓吹“兴民讨阀”，打倒政党和财阀。

那么国家革新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是否通过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方法就能解决日本社会问题呢？大川周明否定西方的思想。他从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判断西方文明陷入危机。战争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而且还对精神生活带来冲击。“现代欧洲立足于物质的、现实的人生观，强调经济生活，以所谓的‘经济人’为典范，以此作为人生最终的目的。对于欧洲而言，这次无法估算的物质损害，实际上不得不是说不是致死的打击。”在他眼里，欧洲思想的核心是以物质生活为第一，但是战争却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反过来打击欧洲人的心理。他引用西方人的评论说明西方的思想精神危机：“现在我们看到伴随战后的道德理想的凋落和低下。战争真正的危险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大概战争本身使人的精神更加高尚吧。悲惨堕落经常出现在战后。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黑暗的前途。我相信欧洲精神在战后堕落到令人战栗的程度。”关于一战后欧洲的社会，他批评道：“源于社会制度的悲惨、风俗的败坏、酒精中毒、马尔萨斯主义、投机的企业、动物虐待、对财物不知满足的欲求，残忍的游戏、无节制的享乐主义、放纵的快乐，这是欧洲赤裸裸的真相。”总之，他深信欧洲社会全面堕落，表明欧洲文明遇到危机。

他以西方文明原理为对立面，提出东方文明原理。“‘光明来自东方’——对这一古语赋予新的内容而实现之的时刻到了。日本作为解放非白人的战士，必须彰显灵魂的光

『五一五事件尋問調書』，橋川文三編集：『超国家主義』，東京：築摩書房，1964年，第354頁。

大川周明：『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東京：大鐙閣，1922年，第6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65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67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84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85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86頁。

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尽快把遮蔽内部灵魂光辉的一切乌云彻底扫荡。我们日本的改造就是世界的改造。我们的主张不是以个人或所有人福利为目标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期待是建设‘实现理法的国家’。国家的目的是完成人类的道义，人类的道德本性在国家当中实现至善，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实际上是讲述儒家根本精神的《大学》在其首章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实现的条件是，内面格物致知，外部要求治国平天下。两者正是同一种思想。大学之道在智识方面要求格物致知，即把握存在于万物背后的理法，实践方面要求治国平天下，即在国家组织上实现理法，以此实现至善，即人类至高的正义。奈良时代日本开始树立国民自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把握印度思想的精髓，将国家看作是妙法的实现，期待在日本实现庄严佛土。我们一方面要克服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把国家看做利己的机构，另一方面扬止社会主义思想，即把国家看做是统治阶级掠夺的工具。新的建设和组织就是这样的国家。世界大战是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日本必须停止对日落的欧洲过度的崇拜和畏惧，扎根于日本精神，通过无限的努力，将一切最为珍贵的东西，从日本精神内部提取出来，在内外实现，一贯到底。”

大川周明提出东方文明的原理，称为“道义国家”。国家和社会按照道德、义理的原则建立。他列举儒家《大学》的思想和日本奈良时代的佛国净土思想作为“道义国家”的典范。日本国家应该按照“道义国家”的理想发展。大川周明据此排斥资本主义（即“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以功利为核心，社会主义强调阶级利益。两者本质上都是以追求物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原理，而一战的破坏表明西方文明原理破产，因此反对西方化。大川周明基于文明论的认识提出国家革新运动的理念。

基于“道义国家”的原理和反西方的立场，以及前述君民一体的国家观，大川周明对日本思想界非常不满，以此作为国家革新运动的另一个原因。“在现代日本，恶用稳健着实的名义、流行起来的政治思想，是发源于英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潮，这是和以国家主义、理想主义、奋斗主义和精神主义为生命、永远旺盛的日本的精神完全不相容的思想，但是世界大战以来以江河决口之势传入我国。”他意识到一战以来，民主化思潮影响到日本，并指出西方民主思想和日本国家意识、民族精神间的对立。对立的表现是，日本国家的核心是“日本精神”，而西方民主主义是只顾眼前物欲的思想。他对民主的指责和对西方文明原理的批评是一致的。他担心西方民主思想会使日本变成“被民众所左右的国家，被不上进的民众所支配的国家，从而，国家失去为理想和志业而奋斗的精神”，其“理想”指的就是“宝祚无穷”、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以“确保日本及日本人永远的独立和繁荣”。

简言之，大川周明担心民主思想会冲击日本文明及天皇制，因此极力排斥民主思想，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東京：大鐙閣，1921年，第387頁。

大川周明：『国民的理想の確立』，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75頁。

大川周明：『国民的理想の確立』，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75頁。

大川周明：『国民的理想の確立』，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75頁。

与大正民主潮流相对抗。他从天皇崇拜和君民一体的国体观出发，批评政党和财阀，反对民主主义，提出道义国家思想，并将之作为国家革新运动的理念。

为了实现国家革新运动的理念，大川周明顺应当时的结社风潮，创立“行地社”，创办刊物《日本》，在《日本》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亚细亚主义和国家主义，鼓吹“二次维新”。他以发表文章和演说的形式，吸引“志同道合”者，并且在军部当中扩大影响力，和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幕僚军官建立密切的关系。1931年，利用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形势，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但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最终未遂。大川周明此后放弃了暴力政变的方式，通过巡回演说，宣传思想，鼓动国民推翻政党政治，支持对外强硬论。由于他向发动政变的军官古贺清志等人提供武器，“五·一五”事件后被逮捕，并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1937年出狱后，大川周明通过著书和电台广播，宣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动员国民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服务。

二、改造社会的“道义国家”理论

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论述集中在行地社刊物《日本》上发表的文章《道义国家的原则》、《经济生活的友爱》、《政治生活的平等》和《精神生活的自由》，以及著作《日本及日本人的道》、《中庸新注》。此外在他的宗教论著作中也有所涉及。以下详细论述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

（一）宗教伦理论——“道义国家”的基础

大川周明将“道义国家”思想概括为“日本及日本人的道”。“我们作为个人，如何合理地生活，如何使我们的国家顺利地发展？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是真正的日本人，我们的国家是真正的日本国，因此作为个人及国家最正确的道，具体来说就是日本及日本人的道。”大川周明将个人生活和国家应有的规则统称为“道”。他所说的理想国家从个人精神生活开始讨论。

1. 人的本质

大川周明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理想，而不是自然属性。“人类的本质，在超越被机械般的自然铁则所束缚的自然生活，过着精神生活——有价值的生活时，才显现出来”。因此，人类必须确立精神生活和道德规范。并且，人应该实现至善。因为“如古人所说：‘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讨论人类精神生活的时候，与其重视一千位凡人的经验，更不如重视一位伟人的经验。”精神道德越是进步，越是能体现人的本质，所以人应该成为圣贤。

那么，道德精神的原则从何处求得？大川周明援引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典籍说明：“例如读孟子就知道‘仁义礼智，非外铄我，我固有之也。’至于王阳明的学问，则竭力说明我们内在的良心在起作用，构成所有的道德。”所依据的印度宗教典籍是《博伽梵歌》：“自己的本然虽有些弊病，也较模仿他人的本然优胜，顺从自己的本然虽死犹荣，模仿他人的本然则有危险。”“康德以其精密的理论阐明道德是不能模仿的伦理原则，但是这一原则早已在此古典当中得到明确，这是我的理解。”《博伽梵歌》原文中的关键词是“达摩”，意思是“义务”、“本务”。达摩是决定个人命运的规律。但是众生可以通过遵守达摩而跳出达摩，与宇宙精神“我”合一，得到解脱。具体方法是每个人应各安其份，不计得失。但是大川意译为“本然”，指的是自然本性。他用儒家心性论说明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頁。

大川周明：『宗教論』，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3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192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29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頁。

大川周明：『日本精神研究』，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113頁。

道德精神是内在于人心；根据自己对《博伽梵歌》的理解说明道德就是顺从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不是受外界制约。那么人本身为什么具备道德精神的因素？大川周明用他的宗教理论说明人性的本质。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生命”。

“自己的生命追溯到自己的父母，从自己的父母到家族祖先、到国家祖先，全人类的祖先，再到宇宙万物的根源，最终和最原始的生命本源合一。本源必须是只有一个的，否则就不是本源。因此，宇宙就是一个生命，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在万物中流淌着。”这个宇宙的生命不但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同时也是在万物当中流动着。“宗教生活，给这个超越个人的生命赋予名称，叫做神。”

宇宙生命，或者说神，内在于万物当中，不是超然于万物之外。同时也内在于人心。“天命就是人内心的天。人类精神活动的根底是统一生命的活动。《中庸》称之为性，我们称之为自我或人格。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内心的天的发现。从而人格层面的行动——遵循人类本性的行为，就是道德”。神（宇宙生命）内在于人心当中，表现为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活动就是宇宙生命在人的内心活动的结果。简言之，人的精神是宇宙生命赋予的。

大川周明要说明的是人的本质在于道德精神，道德精神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源于内在的人心，是宇宙生命所赋予的。因此道德精神具有稳固的基础。

然而，“我们内心潜藏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正如种子并不是树木一样，在实际当中人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神或佛，只是具备实现完满的人格生活的基础而已。”道德精神内在于人心，不等于说人的精神自然就是至善的，因为内在的善心没有彰显出来。所以需要树立伦理规范，将内在的善心变为行动。大川周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精神生活的三原则，作为实现至善的伦理规范。

2. 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

大川周明强调伦理道德是源于内心的，他的伦理学说从感情论展开。“羞耻、爱怜和敬畏的感情，是我们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和自己地位同等的、比自己地位高的对象，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人性本来具有的感情。我们所有的道德关系，最终没有超出上述三者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三种感情是我们人格生活的基础，必须在这基础之上树立正确的生活原则，是事物原理的必然要求。”个人面对外部世界三种不同的对象，对应产生三种感情，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就是基于这种感情而产生的。这三条原则“在中国被称为天地人三才……天即神，是比我们地位高的，地是比我们地位低的，人是和我们地位同等的。所以道德生活就是和天地人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大川周明借用儒家的概念将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61頁。

大川周明：『宗教原理講話』，東京：刊行社，1921年，第13頁。

大川周明：『中庸新注』，東京：大阪屋号書店，1927年，第11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34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41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22頁。

外界三种对象称为天地人，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就是个人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给这三原则赋予名称：克己、爱人和敬天。

简言之，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是克己、爱人和敬天，三者分别源于羞耻、爱怜和敬畏的感情。精神生活三原则及感情基础都有各自的指向对象。羞耻和克己是以地为对象，爱怜和爱人是以人为对象，敬畏和敬天是以天为对象。大川周明用儒家的概念阐释自己的道德学说，提出克己、爱人和敬天的三原则。

关于“克己”的原则，大川周明从“克己”的感情基础“羞耻”开始论述。“人类所具备的道德基础当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注意到的是羞耻的感情。孟子说：‘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我认为，这句话揭示了深刻的道理。”关于羞耻的含义，他进一步阐释，人类具有自然属性，但是人类“感觉到随从自然的生活，被肉体生活的感情欲望所支配，这总觉得不像人类，人类的面目受到遮蔽。正是这种感觉，我们才有羞耻的感情。”羞耻的感情在本质上，是“我们对于比自己价值低的对象支配我们、左右我们这一现象所持有的感情。”而羞耻的意义是，“我们能够超脱自然的生活，开始人类的生活。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自然的生活，过着和动物一样的生活。”简单来说，羞耻的感情是道德的开端，是人和自然界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只追求物欲是可耻的，自然就要克制物欲，由此提出“克己”的原则。“地就是和精神相对的自然，我们对待自然所持有的道德态度，是要征服它。不是为自然所支配，而是支配自然，这样有利于人格的确立，这是首要的道德原则。古人称其为‘克己’。己就是肉体的自我，自然的自我。”

克己的原则是克制物欲，具体到每个人，要求认识自己。“因为所有人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所以首先通过深刻的反省，认识自我的面目，知道以什么为耻，以什么不为耻，才能确立道义的人格。”个人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也就认识到妨碍自己个性发展的不足和诱惑，以此明确具体的征服对象。克制欲望、实现自己个性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克己是战斗，是为了确立人生当中精神的优越地位的战斗。没有这样的战斗，就不能得到胜利的荣冠。”“为了维持自己的特色，得到胜利的生命，我们必须意识到要和妨碍意志力的内外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对于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善就是力量、勇气和意志。”实现克己道德的途径是认识自己的个性和本分，以此为目标，以强大的意志力克制妨碍个性发展的欲望。以意志力战胜诱惑，实现自己的个性和本务这一说法源于他对道会信条“修德”的解释。

但是克己本身不是目的。“克己，即战胜自然，明显是人格生活的基础。”克己只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6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7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7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22-23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9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23頁。

大川周明：『宗教原理講話』，東京：刊行社，1921年，第7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47頁。

是实现个人精神进步的途径和基础。在克制欲望、确立自我的同时，也不忘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由此引出第二条道德原则爱人。

爱人的感情基础是怜爱。大川周明同样引用孟子的人性论展开自己的论述，以孺子落井的比喻说明人有怜爱之心。至于怜爱感情的起源，他进一步解释。“个人绝不是独立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背后，有着更为根本的大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因此人与人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相互融合，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因此，如同自己的生命得到发展一样，希望他人的生命得到发展的愿望，在我们心底里涌现出来。”同样，“看到他人的生命得到发展，对此感到高兴，这是因为对方是和自己共同的生命。生命的共通性发展成为我们的爱心。”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在的感情联系互相关爱。这是怜爱感情的原理。但是怜爱只是一种感情，需要加以引导，明确爱的对象。由此引出爱人的道德原则。“使每个人免受伤害、并使其生命得到发展就是仁爱。”他所说的生命偏重道德精神的含义。“所谓人格就是理性认识和道德践行的主体。我们凭借理性，而具备认识宇宙一切事物的无限可能性，凭借意志，而具备在生活中实现事物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儒教将此人格的无限性称为‘良知良能’。因此，和人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互相帮助，使潜藏良知良能的生命得到发展。”

爱人就是帮助别人的精神得到进步。大川周明主张爱人道德的同时，批评利己主义。“我们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就必须摆脱 egoism 即利己主义。所谓的利己主义，就是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存在，即只有自己有价值，所有的存在都是满足自己的手段。”简言之，爱人的道德基于人性所具有的怜爱感情。爱人的要求是促进别人精神的进步，反对利己主义。关于爱人原则的原理说明也是源于对道会“爱人”原则的解释，强调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条原则是敬天。敬天的感情基础是敬畏。敬畏的感情最直接的体现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孩子的内心产生对父母敬畏的感情，因为父母是自己的生命本源。人类唯有通过父母的生命，直接和贯通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连接。孩子感觉到父母比自己更优越。孩子所感觉到的，就是在一切有价值的存在当中，价值最高的、贯通于万物的生命。”人们最初通过父母感知生命的本源，后来逐渐认识到所有生命的根源“宇宙生命”。并且，人们敬畏终极的生命本源，渴望与之合一。“把这个生命内化于自己的心中、把自己交托于这个生命，这种愿望生发于人性深处，从而成为包含全我的严肃要求。为了实现这一要求而努力，就是从人格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宗教’。”宗教就是对“宇宙生命”的敬畏。大川周明特别强调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情是宗教的基础和核心。将敬畏的感情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2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2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2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62頁。

大川周明：『中庸新注』，東京：大阪屋号書店，1927年，第4-5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27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40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40頁。

引导为道德就是敬天的原则。敬天最基本的要求是孝，因为父母是生命的本源。

敬天不仅要求孝，还要求忠君。天皇也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因为“在日本，天皇和国民的关系，本质上和父子关系相同。日本天皇是由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随着共同体自然地发展而成为国家的君主。并且，建国以来，国祖的子孙延绵至今，护持着国祖的生命。”孝和忠有密切联系。“在家族中，父亲是家族生活中宗教的对象，和父亲之间正确的宗教关系被称为孝，在日本则自然地发展成为把天皇当做国祖的信仰。天皇是国民的宗教对象，和天皇之间正确的关系被称为忠。在日本，国民通过天皇和自己的生命本源联系在一起。统一所有生命，在家为父亲，在国表现为天皇。”天皇既是国家君主，又是国民的大家长，所以忠孝一致。大川周明还刻意强调，“在我们日本，天皇将国祖精神传承下来，自肇国以来一直君临国家，所以对天皇的顺随就是对国祖的顺随，因此忠绝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忠诚道德，而是和孝一样带有宗教意义，即通过天皇顺随神”。忠君不是外部强加的道德义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宗教感情。简言之，敬天的原则要求忠孝，忠孝本质上是宗教，是源于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情。大川的敬畏论受到施莱尔马赫的影响，即宗教的本质在于有限者对无限者的虔敬感情。他实际上以这一理论说明日本的忠孝一致也是一种宗教，将天皇崇拜神圣化。

大川周明围绕敬天的原则，展开论述东方传统思想的特征，表达坚持东方传统的立场。敬天作为道德的原则，同时是宗教。那么宗教和道德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东方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词专门指代宗教？

大川周明首先从基督教开始论述。他指出在西方，关于宗教和道德关系的问题，一直有争论。传统的看法是宗教是道德的基础。西方人基于这种认识对日本持有偏见，认为日本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真正的道德。另一方面，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宗教被斥为迷信。基督教人士对此设法调和宗教和科学、哲学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争论在东方是没有的。“然而不仅我们日本人，中国人也一样，宗教和道德关系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西方学问传进来。维新以前，关于宗教和道德关系的认识，不像西方那样成为争论。要说是为什么，是因为东洋追求的是‘道’。而道包含了我刚才所说的三方面，只有与外界之间实现正确的关系才能体会得到。和比自己价值更高的对象之间建立的关系无疑就是宗教。所以不需要将其抽象化，只是将其作为人格生活的一面，培养宗教的意识。所以没有将宗教和道德区别开来。涵盖这三种关系就是道德，没有价值高低的划分。所以，读《孟子》就看到，孟子并没有说宗教是什么，只是说‘知其心者知其性，知其心者则知天。’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言，畏大人’。又说‘五十而知天命’。”

大川周明认为，敬畏生命本源的意识本身就是宗教，只要有敬畏的意识即可，不需要将其抽象化，变为自成体系的宗教，将精神生活分裂为圣俗两面。他引用儒家的天命观说明古代东方人仅仅是敬畏天，但是没有将敬天的意识变为专门的宗教。古代东方的精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63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63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9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5-16頁。

神生活不严格区分宗教和道德，统称为“道”。大川周明将道义国家的原则称为日本及日本人的“道”，是因为他使用古代中国关于“道”的观念。

但是西方则相反，西方的精神生活存在着圣俗之争。“在罗马人的精神生活当中，和罗马人历史完全不同、且民族性显著不同的犹太人的宗教，即基督教的信仰传进来。而且基督教的信仰，达到了比罗马人宗教更为高级的阶段。因此，宗教和国家关系、宗教和道德关系，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问题，罗马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花费很大的心机。即对于已经被打破的罗马精神生活的统一，如何恢复过来，成为了罗马政治家、思想家烦恼的原因。经过多年的对抗，其结果是，国家和教会有各自的领域，携手并行，但是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衰弱，教会的支配伸向政治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后来基督教经罗马人传入日耳曼人社会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到了近代，新兴民族国家为了排斥罗马教会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支配而奋斗。因此，宗教在西方的精神生活当中被特殊对待。”基督教是高度体系化的宗教，和政治、道德发生了冲突，所以西方存在着宗教、道德、政治之争，三者各有独立的领域。

他认为，理想的精神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本来宗教和道德，仅仅构成我们人格生活的一面，在学问研究方面可以将其抽象出来。但是在现实当中不存在叫做‘宗教’或‘道德’这样的特殊的生活。”在他眼中，东方的传统思想将宗教和道德统一为“道”，是理想的精神生活。而西方人却苦于宗教和道德之争。这里表现出他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而竭力说明东方传统思想的优越性。这和他反对西方文明原理、宣扬东方“道义”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

考察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的理论，可以得出认识，大川周明使用中国、日本等东方传统思想建立自己的伦理学说，提出克己、爱人和敬天三原则。在论述中，有意强调东方传统思想的特性，和西方的价值观对立。

（二）国家和社会的原则——“道义国家”论的内容

大川周明在上述伦理学说的基础上展开论述“道义国家”学说。“道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本质论和“道义国家”的三原则。

1. 国家的本质

关于国家的本质，大川通过解释《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新民，在止于至善”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人格的内面发展到某种程度，相应的社会必然会实现。即家、部族、国家这样的外在的组织形式，与内面深化的程度相适应，逐渐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是个人道德精神进步的产物。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

那么，个人的道德精神，如何外化为社会制度？大川周明以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和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21頁。

大川周明：『安樂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22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5頁。

家族国家观解释日本国家的构成原理。

个人道德外化为社会组织的第一步是以克己的原则组成社会秩序。即克制性欲，建立婚姻关系，组成家庭。因为“人类所具有的自然欲求中没有比性欲更强大的了。人类以外的动物更加显著，顺从性欲繁衍子孙，被认为是出于生存目的。但是人类逐渐建立起婚姻关系，即使在今天看来其最初的形式如何地粗野，不管怎么说，在节制性欲这一点来看，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面目开始展现出来。”所以婚姻是“人类迈出克服自然的第一步”。接着是爱人的原则，“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第三是敬天的原则，“表现为祖先崇拜，成为家庭生活当中重要的事情”。如此，个人道德三原则外化为家族关系。

大川按照这一模式解释社会的演进。“随着我们的道德意识的进步，由许多家族组成的部族的生活逐渐形成。在部族的情况下，道德原则也是相一致，和家族的情形是一样的。因为，部族在本质上是和家族完全相同的共同体，即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许多部族相结合形成国家。在国家的情况下，和国家相应的道德，赋予客观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大川总结日本就是如此由家族、部族演变而成的国家。“尤其是在日本，作为最原始且最根本的道德客观化的组织，即家族，其性质得到长久的保持，前面所说的规范家庭生活的三原则，大致长期维持。随着国家生活的进步，其自然要素逐渐精神化，国家的规范即‘惟神之道’形成。‘惟神之道’是个人内面的道德，作为国家的道表现出来。这个‘惟神之道’支配着我们国民的生活。”关于神道的内容，“我国的神道，是天皇奉神意治理国家之道，同时是国民奉神意侍奉天皇之道”。因为天皇从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成为国家的君主，因此天皇制是日本国家的中心。神道的意义“是日本国的构成原理，并且是规定性的原理。换言之，神道是日本国民生活的根本要义。作为国民，全体日本人依靠神道生存，同时神道必须在日本国民的生活当中实现。因此神道常要求我们要有善良的政治、严肃的道德和高尚的宗教。”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神道涵盖政治、道德和宗教，是日本社会的原理和国民精神生活的核心。

他在宣扬“道义国家”论的同时，批评社会主义的国家观。“然而在当今，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改造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只追求外在的制度改革，蔑视或无视国民精神的反省。他们把应该由个人背负的责任，全都归罪于社会。他们说，社会上的罪恶、疾病和贫困，绝不是个人的责任，全都源于环境即社会组织的欠缺，这是他们异口同声的主张。”大川指责社会主义者只重视外在的社会制度，而轻视内在的精神道德。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6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6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6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6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48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50頁。

大川周明：『国史概論』，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422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91頁。

大川周明：『道義国家の原理』，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59頁。

他同样从道德和人性论出发，展开批评。“然而，把个人看作是彻头彻尾的被动的存在，这种看法无疑是将‘自然’和‘精神’混同。”他援引人和自然生物的区别在于具备道德精神这一判断，认为过于看重社会制度就是过于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的道义精神。因此，“作为法律学乃至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国家，并不是其本身，不过是国家的一面。把抽象的一面当做国家整体来看待，就好像把生理学或生物学的人看作人生的全部，明显是谬误。个人及国家，其根本的面目不在于‘自然’而在于‘精神’，因此，将国家的本质视为道德的主体，在伦理学层面探求的时候，才能正确地把握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即批评法律学和社会学只看重国家制度，而看不到道义精神的一面，并没有揭示国家的本质。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大川周明基于人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这一判断，说明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国家制度只是反映人与外界的关系，只看重这一面就如同只看到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而不在于制度。因此他批评社会主义思想只重视制度而轻视精神。大川周明按照这一原理，以克己、爱人和敬天三原则和家族国家观解释日本国家的构成原理，说明日本是基于这三原则由家族、部族发展成为国家。道德三原则最初表现为家族道德，后来发展为部族伦理，最后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而成为抽象的精神，就是神道。与此相一致，天皇由家族父亲、部族族长发展成为一国之君。因此，日本国家的本质是以君民一体的神道精神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君民一体、惟神之道就是日本国家的道义精神。

2. “道义国家”的三原则

大川周明用道德学说阐明日本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那么“道义国家”的理想也是以个人道德为起点的。“我们居住的日本国家，是日本国民道德的具体实现，因此我们的日本国也当然受到人格生活的原则约束。所以，如同个人道义生活的三方面，作为道德主体，国家的生活自身分为三部分。”这三部分是经济、政治和文教。每一领域都有其理想的原则，即经济生活的友爱、政治生活的平等和精神生活的自由。他所创立的组织行地社的纲领中，也标榜这三条原则。

关于经济生活的友爱，大川周明从经济的本质开始论述。“国家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称为经济生活。”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狭义的个人道德相应。即国家如何处理自然即国土，以何种方式使之最有利于国家是其根本的问题。正如同个人道德，如何通过节制我们的自然生活以完善我们的人格一样，在国家的层面，与之相应的是经济问题。”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第一条是克己，以克制欲望有助于个人精神进步。和个人道德对应。国家的经济就是国家和物质资源的关系，经济原则就是国家如何分配物质资源使其有利于社会。

如同个人克制物欲一样，国家不为物资支配，而是统制物资。基于这一原理，大川

大川周明：『道義国家の原理』，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60-461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60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66頁。

认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是“黄金万能主义”，将物质置于精神之上，使人从属于金钱，因此产生社会问题。“高利贷和暴发户，只要拥有巨富，在社会上、政治上就容易得势。这是世界上所有不幸的本源。”他将拜金主义的根源推到经济学思想。在他眼中，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规律的独立性就是只看到人的自然欲求，而看不到人的道义精神。所以全面否定现代经济学原理。大川从克制物欲的道德原则出发，否认经济规律的独立性。他按照这一逻辑解释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市粮食紧缺的时候，某一商人低价出售粮食而非哄抬价格的事件。商人出于道德心，低价出售粮食，解决市民生活困难，而不是为了牟利而抬高价格。这说明道德意志能克制私欲，经济规律不具有独立性。他基于个人的事例，进一步说明国家统制经济的可行性。“在个人的情况下，是出于主观道德，如果代替个人主观道德的国家意志起作用的话，在全日本广泛的经济范围内，物价法则直接被打破。”最后他提出革新经济秩序的原则，主张国家统制经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

政治生活的平等原则是基于爱人的道德理念。“从本质上说，爱就是个人尽力发展自己应有本分之心，这是以同等价值为前提的。人类在分担共通的生命，从根本上说价值是平等的。爱就是对于与我有同等价值的人，所抱有的情感。爱也是连接人与人关系的感情。人与人相结合的生活组织，就叫做国家。并且致力于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政治’。所以政治的基础在人性层面，就是爱心。爱心的客观组织，或者说具体的表现是政治。对此孟子已经道破。孟子如下所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每个人来源于共同的生命，因此人人平等，互相关爱。以制度的形式实现仁德就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本质是仁德。按照这一原理，理想的政治家是古代的“明君贤相”；“在内心充满救世济民的大爱，并且培养足以得到人民信赖的人格，对此不可懈怠。”政治家必须培养仁德，以仁政治国。和原理相对照，他不满意的是政党政争。“上至大臣下至郡长，除去罕见的例外，几乎见不到潜心修习圣人之学的人。他们只关心怎样增加党员，怎样争取官职，对于苦心于长养圣胎的事情，并不关心。”政党政争造成的问题是：“政民两党进行露骨残酷的政权争夺战，把天下卷入党争当中。每逢内阁更迭，不要说地方长官，就连判任官和佣人都不得受其影响。巡查和小学教师如果不顺从本党，就难免担忧被革职。”他批评政党政客没有像古代的政治家明德修身，培养政治理想，而是热衷于党争，造成社会混乱。对此，大川设想成立完全排斥政党的内阁。

精神生活的自由原则以敬天的道德为基础。大川首先从自由的定义开始论述。“斯宾诺莎把‘自由’定义为遵从自己的自然本性。德国学者称为‘精神’，和‘自然’相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74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70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12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64頁。

圣胎：能够成佛的潜质，长养圣胎指的是通过修行而成佛。在这里以修道成佛比喻道德修养。

大川周明：『日本精神研究』，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272頁。

大川周明：『大東亜秩序建設』，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2年，第789頁。

大川周明：『經濟改革大綱』，大川周明關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關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1998年，第268頁。

对，或称为‘理性’，与‘感性’相对。而儒者称为‘天理’，和‘人欲’相对。因此在欧洲正统思想当中，‘自由’的观念，正好和儒家的‘道’一致。因为儒家的‘道’，《中庸》开头已经揭示，无非是率性而已。而《中庸》把‘性’看做‘天命’。把性称为天命，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我们内心的神’或‘我们内心的超感觉者’。所以，在东洋没有自由思想，这是肤浅的看法。”大川周明列举西方学者对自由的定义，提出和西方学说概念对应的儒家理念。将儒家的道德理念理解为自由。自由不是无限地满足欲望。如果把自由理解为无拘无束，自由地满足欲望，那么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的动物没有区别。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为外部的、器械般的法则支配，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无法实现。”

把自由理解为顺从欲望，就会被自然物欲支配，反而得不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内在的道德精神进步。

按照上述的论断，大川周明批评权利自由论。“正确把握自由原则的人，知道自由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自己得到的，换句话说，自由不是从外部求得的，而是从内心得到。”具体到现实政治，“人类绝对不是被赋予了种种政治权利，然后获得自由。相反，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之后，才得到政治上的种种权力。不然的话，权利有名无实，常常为他人所利用……即国民精神自由程度越高，国家对国民的约束就越少。与之相反，没有自由精神的国民，不得受专制的统治。因为，国民精神程度较低的时候，即使被赋予了政治权利，也不会正确行使”。国民道德精神进步，就会正确行使权利，实现自由。相反，道德素质底下，就不会行使权利，也就不能实现自由。他据此解释选举政治腐败现象：“选举期间的收买行动，是很好的例子。国民被赋予了选举权，却成为金钱的奴隶，从而成为职业政治家的奴隶。因此，国家的‘自由问题’不是‘权利’的问题而是‘教养’的问题。”大川周明将自由限定为内在的道德进步，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利自由。

那么，如何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大川周明提出文教的方针。“自不待言，一国教育的根本，就是对纯真的少年正确地培养国民精神。”“国民必须通过有效的国史教学，将建国精神、国民性的由来、日本国家的本质、以及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牢固把握的日本国家的理想，牢记在心里。”原来所谓的文教理想不外乎是强化国体观和天皇崇拜观念。大川周明强调，自由就是遵从“自然本性”，“自然本性”不是自然欲求，而是《中庸》所说的“性”。大川将《中庸》的“性”解释为宇宙生命赋予人的精神。具体到日本现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0頁。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0頁。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6頁。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6頁。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6頁。

大川周明：『精神生活に於ける自由の実現』，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88頁。

大川周明：『現代教育に対する不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492頁。

实，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生命的本源，同时是日本国民道德精神的来源。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的家族国家。与此相应，家族道德发展为约束全体国民、构成日本社会原理的神道，神道的核心是天皇崇拜。因此，在大川看来，天皇崇拜是日本国民道德精神的根本。文教的核心就是加强天皇中心主义的观念。

综上所述，大川周明将国家视作道义共同体，国家的本质是道义精神外化的组织，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外在的国家制度是相互统一的。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克己、爱人和敬天与国家制度的原则经济友爱、政治平等和精神自由是一一对应的。

三、“道义国家”理论的实质

（一）日本主义的立场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最大的特征是，以道德精神为国家的原理，坚持排斥西方近代的政治权力学说和经济学说。实际上大川周明以日本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大正以来日本的社会。“道义国家”思想本质上是日本主义者的国家观。以下论述日本主义思想的含义和发展，并说明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和日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1. 日本主义的含义及发展

“日本主义”一词最早指的是19世纪末高山樗牛宣扬的日本国民精神论和国家主义。但是高山樗牛宣扬的思想本身有更早的源头，即近代的日本主义思潮比日本主义一词出现更早。高山樗牛本人也把自己的日本主义理论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政教社的国粹主义思想。日本主义是和欧化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相对立的思想及社会势力。日本主义强调日本国家的固有特性和日本民族独立自主意识，重视日本历史传统的优越性，日本在世界上应有的贡献。

日本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明治时代后期表现为政教社的国粹主义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论。政教社国粹主义思想的出现，源于对明治政府欧化主义虚浮形式的批评，以及对民族国家独立的担心。明治初年，政府全面引进西方文明，以求取得和西方国家对等的地位。在明治维新运动前二十年，整个社会沉浸在欧化主义热潮当中。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外交，将欧化主义推向高峰。但是鹿鸣馆外交虚浮的风气和修约谈判上的挫折，使政府受到舆论的批评。部分的知识分子对欧化主义进行反思。他们在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之下，试图对西方化、近代化进行修正。政教社国粹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代表的国粹主义者将日本民族精神和禀赋称为“国粹”，以保存和发扬“国粹”为宗旨，主张在坚持日本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明，反对盲目崇拜和浮华不实的风气，发扬日本民族的“国粹”，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他们担心，崇洋媚外会丧失民族主体意识，甚至威胁到国家独立。国粹主义者关心的是国家独立的问题。

19世纪末高山樗牛承接政教社国粹主义提出“日本主义”国民道德论。高山樗牛称，甲午战争后国民的国家意识逐渐明确。关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成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他正是为了解答这一问题而提出日本主义。日本主义就是“基于国体民性”的实践道德，要求对内尊崇皇室，团结国民，对外伸张国权，维护世界和平。对待外来文化，不问洋之东西，选取各种有益于国体民性的文化。坚持国家主义，排斥基督教，指责其世界主义倾向淡化国家观。殖民扩张是日本民族天性，日本必须对外扩张。简单来说，高山樗牛日本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天皇制国体观统合国民精神。对外来文化的取舍以是否有利于国体为准。对外发展推行帝国主义。

总结上述，明治时代日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国家独立为目标，统合国民精神以保持民族特性，批判欧化主义。明治时代的西方化、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外压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国家独立。西方化如何有利于日本国家独立，即有助于增强日本国家实力，又不至于失去日本民族独特性，是明治时代日本主义

者思考的问题。因此他们竭力说明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以此为方向，统合国民精神。西方化必须在这一基准下进行。三宅雪岭等国粹主义者将日本民族独特性总结为“国粹”，反对崇洋媚外，忘却民族特性。高山樗牛则强调忠君爱国道德是日本的独特性，排斥西方文化中和国家主义不相容的思想。他们的议论侧重于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塑造。

在大正时代和昭和前期，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日本主义思想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形式。这一时期的日本主义者鼓吹“日本精神”、“皇道精神”，以此为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同于三宅雪岭和高山樗牛等人偏重于抽象的理论分析，他们偏重社会批评和变革，以“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论为原理，进行“国家革新”运动。

日本主义者宣扬的“日本精神”或“皇道”以国体观为核心，说明日本国家的原理。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的家族国家。天皇和国民之间既是君民关系，又是父子关系。构成日本国家的天皇制原理是天照大神的意志。这种观念常以“天壤无穷”、“与天地长存”、“万世一系”这些词语表示国体原理是神敕的体现，具有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君民一体的原理是基于自然法则和人情伦理，而不是人为造作的。天皇和国民的关系如同父子，不存在冷酷的权力支配与从属关系。所以日本国家秩序长久稳定。以君民一体的国体原理为基础，形成优良的精神，统称为“日本精神”，如崇神敬祖、家族主义、理想主义、积极进取、公明正直等。日本主义者以国体和“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作为原理，批评现实社会，作为国家革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他们将大正以来日本社会的问题，如政党腐败，经济危机，工人运动等社会弊端和矛盾全部归结到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原理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和忠孝一致的集体主义道德、遵循神国观的理想主义是不相容的。因此西方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矛盾。国家革新运动的原理要求复古主义，超越西方原理。日本主义者基于这种认识对日本社会展开全面的批评，包括对近代国家观、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批评。

对近代国家观的批评主要表现为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日本主义者称，西方国家观以权力支配和从属关系为主要内容，权力用于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西方的国家观实质是把国家看做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而反抗权力压迫，因此西方国家常发生革命。日本国体是天照大神神敕的体现。天皇和国民之间是父子关系。所以日本国家不是协调利益和权力的共同体，而是基于神敕和忠孝一致的“皇道精神”形成的，这是皇统“万世一系”的原因。充满斗争意识的西方国家观与“亲和”的日本国体不相容。日本知识界引进西方的国家观就会否认国体原理。因此日本主义者强烈批评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思想。

比如司法省官僚、国本社领导者平沼骐一郎说：“天祖垂统，于丰韦原建立洪基，圣子神孙相继统治大八州，视万民如赤子，万民如敬畏父母一样崇敬天皇。上下和睦，形成稳定的国体。这一事实是清晰而无法掩盖的。”“直截了当地说，建国精神就是道义立国。道义就是天地的大道。”“我国依据此道义建立，意味着排除人为因素，遵循天理。”

作为国体精神的本质，天理是不变的，所以君民关系十分明确，国家秩序稳定。而在

荣沢幸二：『日本のファシズム』，東京：教育社，1981年，第129-130頁。

平沼驥一郎：『教化の資料』，東京：文部省，1929年，第3頁。

西方，“国家最根本的据点是权力，其目的在于利害。”所以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阶级冲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就是权力和利益原理的产物。“以权力万能和与之相关的法治观念，维持和增进人生的幸福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依靠我国建国精神超克这一原理，就不能实现人生幸福。”平沼骐一郎以天理人伦和权力利益之间的差异将日本国体原理和西方国家观对立起来，表明日本国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种原理论自然也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责阶级斗争学说将国家看作是剥削机构，而看不到天皇和国民之间忠孝一体的道德关系。简言之，日本国体原理和西方国家观的冲突集中在义和利的对立。所谓的“道义”、“理想”实质是神国观和忠孝一致的国民精神。

日本主义者基于以国体观对抗西方国家学说的原理批评攻击政党政治。他们首先从原理上否定政党政治。如津久井龙雄说：“西洋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在原理上和日本主义完全对立。国家的意志由一个时代的大众机械式的同意所决定。也就是说，个人比国家更重要，大众瞬间的意志比建国的理想更加珍重，市民个人的利益比民族统一的使命更为重大。通过选举实现的多数派支配将这种观念表现出来，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违反我国国体本义，从日本主义的立场来看，必须排斥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和国体之间的不相容在原理上是义和利的对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日本国家是以神敕和君民一体的精神形成的，而政党政治依据的原理是个人利益本位。他们基于这种认识批评政党的现状。如赤松克麿说：“所谓政党政治就是政府党和反对党对立抗争的政治形态。政治势力分裂为几个派别，演变为激烈的政权争夺战，这是政党政治必然的趋向。如此，政党没有断然实施国策，而是热衷于政权争夺，所有的活动集中在党利党略，围绕政权和利权反复争夺……他们有害无益的政争如何有害于国政，妨碍国家发展，是国民熟悉的事情。”政党政客热衷于党利党争，而没有顾及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国体精神，是日本主义者常见的政党批评论。他们常以“打倒违背国体本义的既成政党”为政治纲领。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贯穿着国体原理和个人功利主义之间的对立，即资本主义的原理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日本主义者将对功利的追求称之为“唯物质主义”）。日本国体原理的特征是家族国家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指的是日本国家是按照天照大神的意志形成的，因此日本国家的核心在于神敕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和制度，国民必须牢记“建国理想”或“建国精神”，日本主义者有时称其为“精神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和国体原理不相容。他们声称，日本经济社会的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和国体原理的冲突，因此批评资本主义。如桥本欣五郎说：“所谓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经济就是只要自己发财就行。我并非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只是如果放任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个人只要能致富就好，国家变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在这种经济下，兄弟两人只管自己的财富积累，家长或家庭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在乎。如果认为这样的经济思想

平沼骐一郎：『教化の資料』，東京：文部省，1929年，第4頁。

平沼骐一郎：『建国の精神と融合問題』，東京：中央融合事業協會，1932年，第13頁。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下），東京：文部省学生部，1934年，第35頁。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下），東京：文部省学生部，1934年，第36頁。

和我国国体相适合的话，国家就会分裂。”即以家族国家观批评资本主义的利己性，资本主义违背国体原理就是违背人伦（家族道德）。

日本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的同时连带批评社会主义，他们补充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只看重利益的“唯物质主义”，没有认识到日本国家的本质在于国体精神。他们同样以“道德理想—功利物欲”的对立思维在国体原理和西方经济观之间划清界线，因此坚持精神优先于物质。如建国会的井乃香树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构成社会基础的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哲学不过是以此为基础形成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近代以来人们重视经济，轻视道德，所以马克思提出这种说法……那么经济和道德谁是根本呢？是道德为本，经济为末。虽说经济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欲，但是要说到人如何满足物欲，那就是尽可能为多数人而劳动，赋予利益给多数人。与此相应得到报酬，获得利益。如果不给别人利益，自己也得不到利益。不履行道德义务就不能满足物欲。如果满足物欲不通过合乎道德的方式，那就是欺诈、盗窃或乞讨。避免这些不当的手段来满足经济物欲，就必须奖励道德行为。所以道德是原因，经济是结果。”

简言之，日本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由是两者都是满足个人私欲的实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日本精神是相抵触的。因此他们指责西方经济思想轻视道德，要求道德制驭经济。在他们的“国家革新”纲领中提出反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日本主义者认为近代以来统治精英在文化观念上盲目崇拜西方，不带批判意识地引进西方制度和思想，淡化了“日本精神”，是日本政治经济弊端的根源。因此他们在思想文化论方面猛烈攻击西方化。如内田良平将“日本精神”直接总结为国体原理。天皇和国民之间亲如父子，称为“亲子主义”。“我国的家族、社会和国家自古以来以亲子主义为本组织起来……然而模仿西洋文化以来，亲子主义逐渐淡化，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是基于个人主义设立的。伴随个人主义的利己自由思想和权利思想盛行起来。这些思想带来了自私自利的资本横暴主义，社会发展到认钱不认人的地步。”日本主义者批评西方文化败坏了“日本精神”，造成社会堕落。他们所说的日本精神，是以国体原理为基础的国民道德。因此他们在文教方面的主张是加强皇国史观教育，实质上是要加强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观。

综上所述，日本主义者以国体原理作为日本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即“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以神国观、家族国家原理和忠孝一致论说明日本民族特性在于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西方的制度和思想文明的基础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日本文明原理和西方截然不同，盲目学习西方会引起社会弊端。大正以来日本社会的矛盾根源于毫无批判地引进西方文化。因此日本主义者以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原理反对西方化，排斥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思潮对抗。

反西方化、反近代化的日本主义思潮源于对一战后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的排

桥本欣五郎：『世界の現状と皇国の進路』，門司：高次昇発行，1937年，第15頁。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下），東京：文部省学生部，1934年，第50頁。
内田良平：『対外国是の樹立急務』，東京：鈴木一郎発行，1934年，第20頁。

斥。一战后欧洲民主革命的影响，以及日本国内经济矛盾引发的民众运动，促使大正民主运动的发展。日本主义者担心包括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民主化冲击国体原理，因此竭力攻击社会主义，批评支撑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当然，他们也认识到社会的弊端，如一战后战后经济的不景气，政党的腐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基于个人利己主义，和“皇道”国体原理不相容，造成弊害，鼓吹打倒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成为了反近代化的思潮和势力。

2. “道义国家”论的日本主义实质

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属于日本主义思潮。他用儒家的概念阐释自己的国家学说，但最终归结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学说阐明日本的文明原理，是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的家长制国家。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君民关系，而且是父子关系。所以日本国家的核心是，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而形成君民一体的“道义”共同体。他以天皇中心主义为理想，将之称为“道义”，与之不相容的社会现象和思想都是非道义的。他以此为基础展开社会批评，在经济方面鼓吹经济统制，道德支配物欲，批评财阀贪婪利己，在政治方面以古代的贤人德政为理想，批评官僚政党热衷于党争，总之以“道义精神”批评私利。而这个“道义精神”最终归结为，在文教方面所要求的建国精神和国体观教育，实际上是天皇中心主义。

他对政党和财阀的批评不是停留在对社会矛盾的批评，而是以天皇中心主义对抗西方化、反近代化的原理批评。他对财阀和政党的批评，其背后带有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攻击。前述经济生活的原则批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认为重要的价值在于物质，最大的价值在于经济，因此物质的享乐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人生的目的是拥有更多的物质，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即轻视人的精神意义。他指责政党竞争“假惺惺地被称为宪政常道。宪政常道，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议会政治。”大正时期的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以英美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为根底的政治机构”。

而他敌视民主思想，认为民主思想的影响是，政治家为多数人安于现状的要求所左右，失去了“建国的理想”。他还进一步攻击支持民主思想的近代国家学说，批评卢梭和霍布斯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学说“认为国家是实现个人或所有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就是“物质的享乐”。日本国家的核心在于天皇万世一系、君民一体的“理想”；如果失去这一道义的性质，国家早就不成为国家，仅仅是一个盈利团体。

对于自由的理解，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权力自由观，是以儒家的观念说明自由是非政治的、内在的精神进步。上述的批评如同其他的日本主义者一样，以国体原理说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神敕建国和忠孝一致的理想主义、家族国家的集体主义，和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完全对立。如果日本国民接受西方的观念，就会只关心个人利害而不关心天皇制国体的稳定性，最终导致对天皇制的轻视甚至改废，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72頁。

大川周明：『大東亜秩序建設』，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2年，第789頁。

大川周明：『現代思潮批判』，東京：財団法人中央教化団体聯合会，1929年，第13頁。

大川周明：『現代思潮批判』，東京：財団法人中央教化団体聯合会，1929年，第16頁。

日本国家和民族特性就会丧失。

综合来看，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学说表达天皇中心主义，将日本文明的原理总结为天皇崇拜、君民一体的“道义”精神，将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与日本“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对于日本社会矛盾的成因，他作出如下总结：“最后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来，引进欧美的制度文物，致力于将日本欧美化。不仔细考虑日本的习惯和民情，在西方看起来像是好的东西，全都传入日本”。

“道义国家”思想的原理批评论显然存在错误。在西方的国家和社会观念当中，保障个人权利和幸福并不只是物质生活的要求，还有精神生活的需求，如信仰自由、教育平等。和其他的日本主义者一样，大川周明无视这一点，认为西方文明原理的核心就是追逐物欲的功利主义，和君民一体的“道义”精神不相合。基于这种原理批评论，他认为经济矛盾和政党腐败根源于西方近代原理，因此鼓吹天皇中心主义，排斥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和一战以来的大正民主运动的潮流相对抗，成为国家主义和革新右翼的一种思想。

（二）“道义国家”思想和东方文明的特性——东西方对抗论

大川周明宣扬天皇制“道义”精神以排斥西方文明原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抗西方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亚细亚主义鼓吹日本领导亚洲国家对抗西方。对西方近代原理的排斥源于和西方对抗、争霸的意识。大川周明不仅要在日本实现真正的“道义国家”，维护天皇制“道义”精神，排斥西方化的影响，还要在国际上排斥西方的势力，对外扩张。以下论述道义国家思想和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1. 亚洲民族独立论

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说明亚洲民族独立的依据。“个人是有意识和自觉的统一体，所以有理想、主义和道德。当个人由于癫狂或醉酒等其他原因，意识失去统一导致分裂的时候，已经不是统一的组织体。这样的人善恶正邪不分。当今，国家是一个有意识的统一体，所以必然有主义、理想和道义。也就是说，各有各自的个性，即国体，国体的实现和宣扬就是国家最高的正义。”人类的本质在于道德精神而非自然属性，每个人的本质体现在自身的个性和理想。国家如同个人，其本质在于道义精神。“一切的国家，是国民精神的创造，同时是保持并发展其精神的无与伦比的组织。因为具备民族的性情和独特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国家个性，因此其发展的道路不得不各自相异。”国家的道义精神，具体到现实就是民族精神。

大川在此基础上说明国家兴衰的原因。“改造或革新的必要源于国民生命的衰弱和颓废。生命的颓废和衰弱，乃是由于善的力量衰弱，而恶的力量横行。若欲改造，只有认清了潜藏在国民生命中的伟大之物，高贵之物，坚实之物，而使之复兴。并打倒当下横行不已之邪恶。简单地说，所谓改造或革新，必须是以自国之善讨伐自国之恶。假借

大川周明：『日本の言行』，東京：神武会出版部，1932年，第84頁。

大川周明：『国民的理想の確立』，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2年，第481頁。

大川周明：『日本の言行』，東京：神武会出版部，1932年，第76頁。

看起来仿佛是善的外国事物，来代替本国的恶，是绝对不可以的。”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精神，即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善的力量”。国家衰落的原因是，民族传统精神，即“国民生命”衰落。所以国家的进步必须是依靠民族传统精神。这和他在国家革新运动中，排斥西方化、宣扬天皇崇拜的复古理念是一致的。他所说的“恶的力量”指的是和民族精神不相合的外来文化。实际上，在他眼中，和天皇制国体不相容的西方文明原理就是“恶的力量”。

不仅是日本的发展，亚洲各国的独立也是要摆脱西方化的影响。亚洲的革命和独立“不仅仅免于欧洲的政治支配和经济掠夺，实际上是维护自身的信仰。二重独立，即精神独立和政治独立，是觉醒的亚洲正在追求的东西。”亚洲的独立要求实现亚洲精神的独立。实现“精神的独立”，具体的实践要求就是采取复古主义的国民运动。“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国民运动，如果是模仿的、引进的或直译的，即使取得一时的成功，也难以善终。相反，如果扎根于国民本来的精神，发起运动的组织承认国民性的显现，那么其壮心烈志迟早会实现。”国民运动的原理一如个人道德一样是不可模仿的。“所谓兴国运动，就是国内的生命，在机遇成熟的时候，获得新生的力量，卷土重来。每个国家必须复兴自己的‘本然’，不可以模仿他国的‘本然’。”大川周明认为《博伽梵歌》的“本然论”揭示个人道德精神是内在的而不可模仿，同时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国家和国民精神。他为论证复古主义的必然性而任意解释印度宗教的典籍。

总结上述，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论证国家的本质在于民族精神，这是一国的“正义”、“道义”。因此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必须以复古主义的形式进行。按照这一原理，日本必须排斥西方化的影响，亚洲国家的独立也必须摆脱西方文明原理的约束，因为亚洲国家有各自的民族精神，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原理是有害于亚洲国家的发展，是所谓的“恶的力量”。大川周明从个人的道德和个性论出发，说明国家民族精神的独特性，批评西方化，实际是要和西方对抗。

2. 亚洲民族精神的独特性

那么，亚洲国家的传统精神，即文明原理是什么？大川周明称“道义国家”思想的历史依据就是亚洲的传统精神。

在他看来，亚洲的传统精神具有一致性：“东方的根本思想是个人只要形成高尚的人格，良好的社会不用寻求自然会实现。”即个人精神的进步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的进步，两者相统一。“人的现实生活分为宗教、道德、政治三方面，在西欧，这三方面逐渐分离，各自发展，并各成体系规范，但在东洋，这三者并未分离，人生被视为浑然一体的，从而去追求包含这三方面精神生活的整体性规范。因此，在东洋，表达人生整体性规范的词汇，在西洋是没有的。日本のみち、中国的道、印度的达摩都是用来表达人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雷鸣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第2页。

大川周明：『復興垂細垂の諸問題』，東京：大鑑閣，1922年，第26页。

大川周明：『日本の言行』，東京：神武会出版部，1932年，第76页。

大川周明：『日本の言行』，東京：神武会出版部，1932年，第76页。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81页。

生整体性原理的”。比如，“正统的儒家当中，几乎没有人脱离宗教及道德，而仅仅把政治作为思考对象。儒家经常说‘修身治人之学’、‘明德新民之道’、政治家的人格锻炼和政治本身并没有分开”至于印度的宗教，“如同儒家赋予中国人宗教、道德和政治全面的规范一样”，予以印度人精神生活和实践活动整体的规范。日本的国体原理“惟神之道”“常要求我们要有善良的政治、严肃的道德和高尚的宗教。”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思想不仅仅是他的国家哲学、国家改造运动和亚洲民族革命论的理念，也是他眼中亚洲的文明原理，东方的传统思想。日本的神道、中国的儒家和印度思想的一致性在于内在的精神进步，即道德和宗教的进步，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的进步，他所说的社会制度泛指国家和政治。大川周明进一步将道义国家思想总结为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精神。

考察上述的东方文明论，可以得知大川周明将日本的国体原理神道和中国、印度的传统思想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说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文明原理具有一致性，都是以道义国家思想为基本精神。

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原理的核心在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大川周明认为西方文明原理的竞争性充满弊端。“现代欧洲的文化，以实验科学为最终的根基。而一切的长处和短处都在此处。自然界的一切，大到天体，小到细菌，都能为人类的智慧所认识。历史上所谓的专门研究就是从这种自信开始。而真正值得惊叹的成就来源于这种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全部应用于人类实际生活，最大的应用结果通过产业革命表现出来。……欧洲以科学精神充实国力，凭借得到充实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组织统制所谓的资本帝国主义，以此在地球上实行各自所谓的世界政策。世界大战就是他们世界政策的冲突。由于战争，欧洲近代文明的长处和短处全部暴露出来。他们此前一直行进的征服世界的步伐遇到挫折。”如前所述，作为日本主义者的大川周明，以“道义—功利”的对立思维在天皇中心主义和西方化之间划清界限。他把这一对立延伸至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比，批评西方文明原理的逐利精神导致争霸和战争，具有非道义性，和亚洲传统精神“道义”截然不同。

西方文明原理不仅有害于日本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也破坏了亚洲传统精神，是不道义的。大川周明将西方侵略亚洲的过程看作是西方化对亚洲传统精神的侵蚀。近代西方文明伴随对外侵略扩散到海外殖民地。18至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扩张要求“深入内地，投放本国资本以开拓新事业。然而，在这样的地方发展事业，无疑需要建立井然的秩序，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采用近代产业形式，还要给工人稳定的物质供应。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就必须占领这些地区，在原著居民之上确立政治权力。”即西方国家在亚洲内地发展需要往当地移植近代的制度，为了维护新制度，就要军事征

大川周明：『安楽の門』，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1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307頁。

大川周明：『中国思想概説』，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2年，第88頁。

大川周明：『新東洋精神』，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版，第958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86-87頁。

大川周明：『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東京：大鑑閣，1922年，第282-283頁。

服。“他们认识到，在这些地域，为了强制实行经济剥削以实现征服的目的，就有必要将东亚各民族的生活改造成欧洲的形式。东亚各民族的生活和道义、思想、信仰、家族制度密不可分。所以他们的政治支配同时是对亚洲一切文化遗产的破坏。”总之，伴随着欧美对亚洲的征服，西方经济制度等文明要素也传入亚洲，但是近代制度的传入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亚洲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西方压迫，而且传统精神被西方化所破坏。

（三）复兴“道义国家”精神的“大东亚圈”——日本支配亚洲的理论

按照复古主义论，亚洲各国的独立和发展必须发扬传统精神，即道义精神。但是大川周明认为亚洲各国无法恢复传统精神。只有日本是亚洲文明的继承者，所以日本必然具有领导亚洲的地位。

1. 对东洋精神的传承——日本优越论

大川周明对亚洲各国的现状持蔑视的态度。比如对中国的评价：“他们的至善就是孝，至恶就是不祭拜祖先。丝毫不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着想，即使是慈善，也是出于利己主义而谋求相应的报酬。他们在家族之外，不明白共同生活的意义。利己主义弥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国运注定衰颓。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孔孟之本意，孔孟精神在其故土已经消亡。”他声称中国人道德衰落，没有将儒家理想用于现实，导致社会败坏。至于印度的情形，他认为印度传统精神在10世纪以后走向衰落。“衰落的征兆，第一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奋斗意志减弱，创造精神逐渐弱化。第二，没有了对知识的自由探索精神，科学的批判精神逐渐消磨。第三，印度精神早已失去昔日的光辉，只是在少数人的心里得到维持。印度被英国征服，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时期。”“今天的印度，向我们展现了人类作为个体人使庄严之精神升华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只管仰望天空而不顾大地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国民如何沦为奴隶的境遇。”即印度人脱离现实，只关注精神冥想，缺少实践能力。这不符合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外在制度相统一的道义精神。这是印度精神衰落的原因，也是国力衰弱、遭致英国侵略的原因。总之，中国和印度民族没有以一贯之地践行道义国家思想，没有将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外在的社会制度相统一，导致思想僵化，社会败坏，国家衰弱。最终被西方征服。结合前面的西方殖民主义论，可以看出，在大川看来，亚洲传统精神衰落首先是亚洲民族自身的原因，即没有将理想（道德精神）和现实（社会制度）相统一，违背了道义国家的原则；而西方的侵略则进一步破坏亚洲精神。内外的因素导致了亚洲的落后。

而日本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然而在日本，儒家传来之初，便以严格地奉行孔孟之教为中心。菟道稚郎子的自杀，悲壮地证明这一点。所以儒家能使日本国民道德进步。”佛教的情形也是如此。“唯有在日本，佛陀的福音所含有的一切要素，均得以登至最高

大川周明：『大東亞秩序建設』，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9年，第831頁。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の意義及び価値』，大川周明關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關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出版社，1998年，第90頁。

大川周明：『亜細亞建設者』，東京：第一書房，1941年，第291頁。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91頁。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雷鸣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第9頁。

级。现在仍不失为规范国民宗教生活的一种现存信仰。”他独断日本在亚洲具有优越性，因为日本传承了亚洲的传统精神。这里表现出亚细亚主义者的日本优越论。日本具有优越性的原因在于“日本精神”自身。“常怀高远之理想，但不忘却现实；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精进，常思慕理想。现象即是实在，理想即是现实，或者说娑婆即是寂光土，是东洋精神的特征。对这个深奥的真理，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讨论，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是日本民族的伟大之处。”日本精神的优越性在于理想和行动相统一，因此能将儒家和佛教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这是日本能够继承亚洲传统精神的原因。

2. “复兴道义精神”——日本支配亚洲的逻辑

大川周明说明日本和亚洲邻国在文明原理层面的一致性，同时论述日本是亚洲精神的继承者，最终目的是使日本统治亚洲邻国正当化。亚洲邻国的独立和发展必须复兴传统精神，然而这个“道义精神”只有日本传承下来。那么日本复兴亚洲精神、领导亚洲各国就是必然的。日本复兴亚洲精神、领导亚洲国家的方式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学说解释日本殖民体系“大东亚共荣圈”的原理，将“道义”共同体从一个国家延伸至超越国家的殖民体系。在他的理论当中，国家的核心是道义精神，如日本的本质在于君民一体的精神。而日本殖民体系如同一个国家，也需要相应的“道义”精神。

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本质精神，大川周明解释道：“大东亚秩序是雄浑无比的政治机构。然而人类创造的一切的制度或机构，是内在的精神具体的表现，是理念客观的实现。因此大东亚秩序，也必须有相应的精神赋予其基础。”“这一根本的精神，我暂且称为新东洋精神。这必须包含东洋的世界观、东洋的睿智，足以鼓舞东亚各民族，使之振奋起来，但是为了明确其内容，需要种种的条件。第一是认识东洋的传统精神，尤其是正确认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精神”。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精神，前面已有论述。在此要说明的是，大川周明提出日本“复兴”亚洲精神的依据和“大东亚共荣圈”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在近代，大部分东洋国家被欧洲殖民，文化遭遇蹂躏，精神腐败，失去固有的活力与完整……亚细亚复兴不仅仅是政治上摆脱欧洲，同时还是亚细亚民族精神生活恢复固有之荣光，日本在此过程中负有庄严之使命。因为，东洋之美善、高贵在其故国已经是过去式，但在日本却依然有其生命力。将来东亚新秩序的精神基础，就是日本历经千年锤炼而形成的三国魂。而三国魂的客观化或者具体化，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我坚信，正是这个精神，成为大东亚秩序基础的新东洋精神之根底或中心。”他所提出的“三国魂”和“新东洋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雷鸣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第10页。

大川周明：『新東洋精神』，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980頁。

大川周明：『新東洋精神』，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950頁。

大川周明：『大東亞新秩序』，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2年，第837-838頁。

大川周明：『新東洋精神』，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61年，第981頁。

精神”意义相同。

从整体来看，大川周明如此为日本的侵略强辩：中国和印度等亚洲邻国的独立，必须发扬各自的传统精神，如儒家和佛教。但是只有日本继承了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精神，所以亚洲邻国失去了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靠”日本。日本精神就是三国精神，日本统治亚洲的殖民体系“大东亚圈”就是以包容神道、儒家和佛教的“三国精神”（“亚洲精神”或“新东洋精神”），而非单纯的日本精神（神道）统治亚洲国家，“帮助”亚洲国家复兴传统精神，“复活古有之荣光”。

实际上他恶用了东方传统思想美化“大东亚圈”。他辩称：“日本国民，有意或无意地，对中国及其他的东亚各民族持有深深的爱心。使日本成为东亚指导者最根本的资格，实际上是这个爱心。在东洋，政治不外乎就是‘仁’的具体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首先必须是‘仁’的具体的实现。因此日本否定近代殖民地的榨取政策。这是因为，如同欧美殖民国的政策，阻止殖民地社会的进步，任由原住民处于文盲状态，唆使内斗，永久固定于隶属贫穷的状态，其必然结果是，以招致被支配民族的憎恶怨恨而告终，这样功利的算计，是日本的‘仁’所不允许的。”他在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思想当中，以东方的仁德和仁政作为政治理想，称之为“道义国家”的原则，但是同时以仁德作为殖民统治的理念，将“大东亚圈”美化成按照东方仁德统治亚洲的“道义”共同体。他批评西方国家为了私利而侵略亚洲，这是合理的，但是他以“道义”将日本的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区别开来，这不过是为日本的侵略寻找正当的理由而已。

“道义国家”论的虚伪性不仅表现为美化“大东亚圈”，还表现在，他以“道义”论说明日本不可以平等地对待亚洲各国。“把人类看成是一种动物，这是肤浅的见解。人类不是一种，即不是在同一进化阶段的动物，实际上是很多种不同阶段的物种的统称。某甲和某乙之间，存在着如同鱼类和鸟类之间那样的差别。人类平等，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理性认识一切，通过意志践行道德行为，在这一点上是平等。但是这种可能性实现到什么程度，世界上没有什么像人类那样的不平等吧。以往我对所有人平等对待过甚。今后要差别对待。对于像猴子的人，要像对待猴子那样对待，对于像狗一样的人，要像对待狗一样对待。这样对待像猴子或狗的人，他们反而会高兴。”人类的本质在于道德精神，从这一点来说人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道德精神的实现程度有差别，因此人有优劣之分，如同人类和自然动物之间的差别，所以人类内部必然等差有别。

他按照这一原理解释日本民族和亚洲各族之间的差别。“我接触过很多亡国的国民。中国人、朝鲜人、印度人、安南人、爪哇人等。对于这些亡国之民不可以和日本人同等对待。如果以对待日本人那样的道德上的期待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慨”。“他们是道德低劣的国民，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为亡国之民。所以无法接受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当然的。”人和自然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无道义精神。在人类内部，道德精神的实现程度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差。国家的本质如同个人一样在于道义精神。国家

大川周明：『新亜細亜小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年，第45-46頁。

大川周明顯彰会：『大川周明日記』，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86年，第142頁。

大川周明顯彰会：『大川周明日記』，東京：岩崎學術出版社，1986年，第142-143頁。

的发展取决于民族传统精神的发展。因此国家的衰落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衰弱。按这一逻辑，民族精神的衰弱相当于个人道德的退步，那么亡国之民就是道德卑劣的民族。与此相对，日本民族是道德精神“高尚”的民族，自然两者之间形成等差。因此日本不可以平等对待亚洲各民族。大川周明以道义精神的“水平高低”对亚洲国家划分等级，妄称亚洲各民族“道德低劣”，“不及”日本，实际上用“道义”理论表达民族歧视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日本支配亚洲各国的必然性。从这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川所谓的“道义”论充满虚伪。

结 论

大川周明作为日本国粹主义者，同时以印度宗教研究者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受西方殖民侵略的现状。亚洲国家在宗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然而为什么近代以来走向衰落？大川周明从文明论进行解释。亚洲国家的文明原理是道义国家精神，内在的道德精神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的进步。但是由于亚洲民族没有坚持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没有将道德精神和外在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导致道义精神僵化，社会制度败坏，国家衰落，遭致西方的侵略。今后亚洲国家的独立发展就是恢复道义国家的传统，要关注现实政治，将道义精神和社会制度重新结合起来。大川周明对亚洲文明的解释是从他对印度宗教的认识延伸出来的。但是他作为日本国粹主义者，坚持日本优越论和扩张主义。大川周明是出于鼓吹日本征服亚洲邻国、和西方争霸对抗的目的意识，阐释中国儒家和印度宗教，提出道义国家思想。

大川周明基于自己的宗教原理，说明个人的本质在于道德精神。他以此阐释国家的核心在于民族精神。因此国家的发展必然是采取复古主义形式。在此基础上说明亚洲各国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方。他以“道义-功利”的对立思维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划清界限，将日本和亚洲邻国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说明日本的天皇制国体原理“惟神之道”和中国的儒家、印度的宗教都是一致的，即道义国家原理。与之相对，对西方文明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贬斥为追逐物欲的个人功利主义。由于文明原理的不同，西方化就是对亚洲道义精神的“破坏”。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天皇制国体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因此他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与大正民主运动潮流相对立。实际上，以天皇制国体原理批评西方化是大正时期以来，以“日本精神论”、“皇道精神论”为代表的日本主义思潮的一角。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达日本主义的原理批评。对于亚洲邻国的认识，也是坚持复古主义的立场，西方侵略亚洲，不仅是政治上的压迫，而且是对历史传统道义精神的败坏。亚洲国家的独立必须恢复道义精神。但是大川周明蔑视亚洲邻国，认为亚洲各民族已经失去了道义精神，只有日本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日本统领亚洲就是为了“帮助”亚洲各国复兴道义精神，以东方的道义精神统治亚洲邻国，不同于西方，为了掠夺财富而以残酷的手段剥削殖民地。实际上他是为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寻求正当的理由的。

可以看出，大川周明为支持日本对外侵略、和西方争霸，而任意解释东方传统思想，拼凑出“道义国家”思想。他竭力说明日本的核心是天皇制国体的道义精神，充满竞争和功利意识的西方文明原理是日本社会弊端的根源。实际上是源于和西方对抗的意识而有意全面否定西方化、近代化。他以“道义国家”思想说明日本和亚洲邻国在文明原理层面上具有一致性，同时强调日本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而具备领导亚洲的地位，不是重复以掠夺为目的的西方殖民主义，无非是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为日本的扩张辩护。因此“道义国家”思想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以东方传统思想中的概念造成温情的假象，掩

盖扩张的实质。

参考文献

基本史料

- [1] 桥川文三編集. 大川周明集[M]. 东京: 筑摩书房, 1975.
- [2] 松村介石. 道会の主張[M]. 東京: 天心社, 1912.
- [3] 松村介石. 新宗教[M]. 東京: 香山吉助発行, 1925.
- [4] 松村介石. 道と宗教[M]. 東京: 天心社, 1909.
- [5] 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 大川周明関係文書[M]. 東京: 芙蓉書房, 1998.
- [6] 大川周明. 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M]. 東京: 大澄閣, 1922.
- [7] 橋川文三編集. 超国家主義[M]. 東京: 築摩書房, 1964.
- [8] 大川周明. 日本文明史[M]. 東京: 大鐙閣, 1921.
- [9] 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 大川周明全集[M]. 東京: 岩崎学術出版社, 1961-1969.
- [10] 大川周明. 日本及日本人の道[M]. 東京: 社会教育研究所, 1925.
- [11] 大川周明. 宗教原理講話[M]. 東京: 刊行社, 1921.
- [12] 大川周明. 中庸新注[M]. 東京: 大阪屋号書店, 1927.
- [13] 平沼騏一郎. 教化の資料[M]. 東京: 文部省, 1929.
- [14] 平沼騏一郎. 建国の精神と融合問題[M]. 東京: 中央融合事業協会, 1932.
- [15] 文部省思想局. 日本改造運動(下)[M]. 東京: 文部省学生部, 1934.
- [16] 橋本欣五郎. 世界の現状と皇国の進路[M]. 門司: 高次昇発行, 1937.
- [17] 内田良平. 対外国是の樹立急務[M]. 東京: 鈴木一郎発行, 1934.
- [18] 大川周明. 現代思潮批判[M]. 東京: 財団法人中央教化団体聯合会, 1929.
- [19] 大川周明. 日本の言行[M]. 東京: 神武会出版部, 1932.
- [20] 大川周明. 日本二千六百年史[M]. 雷鸣译. 上海: 政治月刊社, 1941.
- [21] 大川周明顕彰会. 大川周明日記[M]. 東京: 岩崎学術出版社, 1986.

学术专著

- [1] 刈田徹. 大川周明と国家改造運動[M]. 東京: 人間の科学社, 2001.
- [2] 野島嘉响. 大川周明[M]. 東京: 新人物往来社, 1972.
- [3] 大塚健洋. 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M]. 東京: 講談社, 2009.
- [4] 万峰. 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M]. 東京: 六興出版社, 1989.
- [5] 呉懷中. 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国[M]. 東京: 日本僑報社, 2007.
- [6] 前川理子. 近代日本的宗教論と国家[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5.
- [7] 栄沢幸二. 日本のファシズム[M]. 東京: 教育社, 1981.

期刊文章

- [1] 金内良輔. 革命児・大川周明[J]. 文藝春秋, 1965(2): 206-214.
- [1] 鈴木正節. 道会と大川周明[J]. 武蔵大学人文学会雑誌, 1985, 17(1): 43-87.
- [2] 大塚健洋. 行地社機関誌月刊『日本』目次及び解題(上)[J]. 姫路法学, 1989(3): 53-116.

- [3]大塚健洋．行地社機関誌月刊『日本』目次及び解題(下) [J]．姫路法学,1990 (5): 112-144.
- [4] 嶋本 隆光．大川周明の宗教研究：イスラム研究への道 [J]．大阪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8 (34): 1-22.
- [5]石川晃司．大川周明における思想と政治 [J]．湘南工科大学紀要,1993 (1): 131-141．
- [6]赵哲．大川周明和日本法西斯主义 [J]．日本研究,1986 (2): 58-61．
- [7]崔新京．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 [J]．日本研究,2002 (4): 58-61．
- [8]田富．论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 (3): 84-86.
- [9]田富．论大川周明的历史观 [J]．社会科学战线,2012 (10): 259-260．

学位论文

- [1]Barve Tejaswini Ramesh :大川周明 (1886 ~ 1957) とオーロピンド・ゴーシュ (1872 ~ 1950) : 大川の行動を支えた思想的背景の研究[D]:博士学位論文．大阪：大阪大学，2013．

附 录

大川周明年表

年份	经历	社会背景和重大事件
1886 年	出生于山形县饱海郡	
1907 年	就读于东京大学，专攻印度哲学	
1910 年	加入道会	
1913 年	日本主义、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1916 年	发表《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和由来》，向国民宣传亚细亚主义思想、批评英日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任职于满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 年	和北一辉建立“犹存社”，开始“国家革新运动”	巴黎和会 中国五四运动
1924 年	成立“行地社”，通过刊物《日本》宣传“国家革新运动”思想	1924 年护宪运动
1931 年	发表《满蒙问题的考察》，宣扬“满蒙生命线论”；密谋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发表《国史读本》，宣传皇国史观	九一八事变
1932 年	成立“神武会”，鼓动民众反政党；因五一五事件被逮捕	上海一二八事变 伪满洲国成立 五一五事件
1937 年	出狱	卢沟桥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
1939 年	发表《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宣传皇国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2 年	发表《美英侵略东亚史》，动员民众支持对英美战争	太平洋战争 日军占领东南亚各地
1943 年	发表《大东亚秩序建设》	日本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
1945 年	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后来被释放）	日本战败，二战结束
1957 年	病逝	

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要过去了，回归这三年来的经历，感慨很多。

当初选择大川周明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关心这个问题：日本近代社会发展是向西方学习近代文明的过程，但是大川周明却固执地反西方，从经济、政治、文教各方面和西方文明全面对立。为什么如此极力排斥西方化？当初带着这个问题写论文。周老师提示，要将他的思想放在近代日本主义思潮发展的脉络中去研究。于是我搜集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从大正、昭和前期的军部、官僚、学者、浪人各种群体留下的资料中搜集含有日本主义的论述，了解到当时以日本“国粹”（国体、“皇道”、“惟神之道”之类）排斥西方价值观的想法并不少见。原来国粹主义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明治时代后期政教社成员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明治二十年代以后一直存在。我感觉，梳理了近代日本主义和欧化主义之间的对立，对于大川周明思想内在的理念就很比较容易理解了。大川周明的国家主义思想并不是空泛的“举国一致”、“天皇万岁”，他以一套理念展开自己的国家思想。通过对大川周明的日本主义（或者叫国粹主义）思想的分析，有助于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特质。

我的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周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思路，和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不仅在论文写作方面的交流，还有平时课堂学习和聚会，老师的教诲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的内心。我能坚持保持干劲，是因为我要以行动感谢周老师的关心和期待，不敢懈怠。回想过去，我正是以这样的心，耐得住寂寞，压制住烦躁，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同时也感谢李小白老师在学习上、生活上的教诲和指点，让我懂得了很多东西。

周老师知道我搜集资料遇到困难，向我介绍北华大学全成坤老师。全成坤老师也是研究大川周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交流，就论文写作提供意见，还有日本学界最新的研究论文。在此对全老师表示感谢。

同时感谢同门的同学，三年来一起生活，在嬉笑打闹中，互相勉励，共同成长，留下美好的记忆。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刊发时间	刊物级别	第几作者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评析	《北华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省级期刊	1